

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

林麗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帝鑑圖說》原來是一本手繪手抄附插圖的皇家講讀教科書，由張居正（1525-1582）在隆慶皇帝（1537-1572, 1567-1572 在位）過世後不久，領導群臣編纂而成。萬曆元年（1573），此書被刊刻上板，從現存藏在日本宮內廳圖書館的潘允端本版畫來判斷，無論是原初的繪稿，或是後來的刻工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因此，本文將會首先解析藏於宮內廳的潘允端刻本《帝鑑圖說》的相關出版狀況。同時，種種跡象顯示此本可能是最接近原手繪本者，故以此版本為主，討論《帝鑑圖說》的內容、編輯的目的、圖文相配的狀況，並透過其他文獻的輔助，進一步剖析此書對萬曆所帶來的影響。同時，不單只使用文字敘述，透過此書的插圖，張居正也巧妙地傳遞難以言說的訊息，並成功地導引萬曆皇帝模仿前代君主之賢良事蹟。因此，本文也企圖剖析出，文字與插圖所各自出傳遞的重要訊息。藉此，解析出張居正編纂此書的真正用心，並試著探求以往在藝術史研究中論及鑑戒畫類時，較難著墨的部分，亦即，鑑戒繪畫對於被鑑戒者所產生的效力，並重現此書在萬曆前十年的政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帝鑑圖說》、明代版畫、張居正、鑑戒畫、萬曆

前 言

歷來有關中國歷史論述中張居正總是被形塑成改革的急先鋒。張居正（1525-1582）的確在明代後期關鍵時刻實行一連串的措施，重新為漸趨於衰弱的明朝注入新活水，這股力量似乎又為明代多爭取了數十年的國祚。¹ 其實，張居正從政數十年，一直到萬曆朝（1573-1620）的前十年，才能真正一展長才，大刀闊斧的施行種種舉措。亦即，直到他政治生命的最後十年，才是他贏得中國歷史上變法成功聲名的最關鍵時期，² 而這施政的基礎就是建基於萬曆對他極端的信任與依賴。諷刺的是，在中國實行新政與變法，往往引來眾多的反對與災禍，為了不招致變法改革的指控，張居正從一開始便高舉著遵守祖宗成法的大旗，教導萬曆要敬天法祖。³ 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1555-1634），曾提及他的父親最在意的便是原有的典範，凡事無不遵循原有的典故。因此根據他的說法，在他的父親當政時，很少採取任何新措施，幾乎所有的舉措均是來自前代的典章制度。有時只是因為政策較為窒礙難行，張居正的政敵便稱他為變政。張懋修認為這是因為指控他父親的人並未好好的鑽研前代的制度，以致於無法理解其父施政，而誤以為張居正非常的激進。⁴

張居正如果真的如此在意「典故」，為什麼在中國歷史卻是以一個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下列的研究顯示，張居正的改革的確奠基於他對過去的了解，他似乎十分明瞭唯有標舉著古代典故的大旗，才能對抗這些抗拒改革的勢力。另一方面，他所標舉的古代卻不是遙遠如三皇五帝，他所遵循的「典故」實則來自較近的朝代。作

-
- 1 有關張居正的傳記資料與研究，詳見 Robert Crawford, "Chang Chü-cheng's Confucian Legalism," 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ed. William T.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67-413; Frederick W. Mote, 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pt.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明代名人傳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53-61;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13,〈列傳一〇一·張居正傳〉,頁5643-5654;張舜徽主編,吳量愷、崔曙庭、李國祥註解,《張居正集》四冊(湖北:荊楚書社,1987);楊鐸,《張江陵年譜》(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63,原著於1658;重印本),〈江陵柄政〉;林麗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歷史學報》,24期,1996年6月,頁61-76;樊樹志,《萬曆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更多的相關研究與資料可另詳見於上述樊樹志與韋慶遠之著作。
 - 2 韋慶遠指出張居政的變法企圖已開始於隆慶三年(1569)。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4-5。不過接下來的萬曆時期,才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改革最激烈的時刻。韋慶遠也特別以數章的篇幅詳細的討論張於萬曆的前十年施政的種種結果(頁498-793)。
 - 3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1,〈江陵柄政〉,頁654。
 - 4 張懋修的這段話原來是題在張居正所寫的書法作品上,當張懋修編纂其父的文集時將其書法文字與他自己的題記一併收入文集中。詳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686。

為一個重視實際而非只是食古不化的學者，張居正從他年輕供奉翰林院時，即相當認真的研讀著明朝前代皇帝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典章制度。供奉翰林的這段期間，他一直潛心充實，以待將來有機會，即可一展長才。⁵

隆慶六年（1572），隆慶皇帝（1537-1572）駕崩，張居正已是顧命大臣，被託付輔佐萬曆，且最終大權獨攬，開啟萬曆前十年的改革。⁶對於張居正而言，大權在握，並不只是為了滿足權力慾望，更重要的是，他終於看到可以全面施行其政治理想的契機。對於企圖心強盛的張居正來說，這真是難得的機會；但是他也十分清楚，作為明帝國的首輔，其權力的來源，是登基不久的萬曆小皇帝以及小皇帝的生母李太后。當時萬曆年僅十歲，張居正深知他的改革成敗，實際繫於萬曆的支持與否。作為萬曆的老師，張居正更感到萬曆教育的重要。因此，在隆慶駕崩僅僅兩個月後，張居正便已上疏，要求重新開始萬曆的講學。雖然因為隆慶帝喪事未了，不便舉行經筵，但卻可以開始日講。疏文中，他十分清楚的表達了對萬曆教育的重視：「臣等謬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⁷對於開導聖學，張居正其實有著相當周密的思慮。身為臣下卻要教導主上，實在並非易事。因此，使用過往的故事，特別是講述蘊含道德教訓的前代君主事蹟，既可傳達特殊的訊息，又不會直接的冒犯主上，的確是相當適宜的教材，《帝鑑圖說》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製成。

之前已有不少學者針對這本書做了研究，釐清《帝鑑圖說》現存多種版本的部分問題，以及推測此書在流傳過程中功能的改變。⁸日本學者尤其做了許多重要的

5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 76-80。

6 有關張居正與高拱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張居正如何聯合萬曆生母李太后與內廷太監馮保的勢力，共同驅逐高拱之事，詳見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 408-483。

7（明）張居正，〈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70。黃仁宇對於萬曆被規定的日常功課，有極生動與詳盡的描寫，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2001），頁 10-11；日課內容可見於張居正另外的疏文：〈請酌定朝講日期疏〉及〈擬日講儀注疏〉，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73、74-5。

8 本文部分研究成果已有英文文章發表，詳見 Lin, Li-chiang,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321-359.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之基礎，再加上新的調查與論述所完成。針對此書，之前即有許多相關研究，如 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XXXI (2001): 65-101. 《帝鑑圖說》相當早就被帶入日本，最早的和刻本出版於 1606 年是豐臣秀吉（1536-1598）的兒子豐臣秀賴（1593-1615）所主導的。由於這些流通於十七世紀日本的眾多的《帝鑑圖說》的圖像，十七世紀的日本畫家繪製了許多的相關圖繪。因而日本學者其實是最早注意到《帝鑑圖說》的學者群，如河

研究，主要是因為從十七世紀中開始，日本畫家就畫有不少的《帝鑑圖》。所謂的《帝鑑圖》，其實是根據中國《帝鑑圖說》的版畫或者是日本重刻的版畫為藍本，而畫成的圖繪，日本的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就曾經舉辦過不少中國版畫與受到中國版畫影響的日本繪畫展。尤其是一九九〇年的展覽與展覽圖錄，更進一步將《帝鑑圖說》與其相關的圖繪的能見度，推展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因此，後來 Julia Murray 即陸續寫有兩篇相關文章出版，他的專書 *Mirror of Morality* 也以《帝鑑圖說》做為論述規諫畫類的重點之一。甚而在另一篇談論中國敘事畫的文章中，他也再次以《帝鑑圖說》作為焦點來談，這次也將新的材料置入。⁹ 雖然如此，仍然有不少重要而有趣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探討。譬如說這本書可能是如何編纂而成的？書中的內容取自何處？中國歷代就編有不少這種以史為鑑的書籍，¹⁰ 為什麼張居正還需要一本這樣的歷史書來教育皇帝？這本書真的只是單純的教科書嗎？這本書到底有何影響？

作為皇家教材的《帝鑑圖說》，因為留有較多的相關資料，因此重建其製作的過程、編纂的用意、使用的狀況、甚至是規諫的成效，都成為研究的可能。本文首先將處理現存藏於日本宮內廳被稱為官版的《帝鑑圖說》之版本問題，接著則將焦點集中在張居正編纂此書的用意上，詳細剖析他如何的挑選與架構整本書的內容；

野元昭，〈探幽と名古屋城寛永度造營御殿〉，《美術史論叢》，1985年2期，頁91-116、1988年4期，頁131-153、1990年6期，頁99-124。簡要的日本學者研究的敘述，請見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二冊（東京：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90）；以及神原悟，〈帝鑑圖小解〉，《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2，頁124-137。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期（1990.2），頁11-31。中國與臺灣學界則有陳生璽、賈乃謙，《帝鑑圖說評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頁1-13；牛建強、汪維真，〈從《帝鑑圖說》看十六世紀末的中國帝政〉，《史學月刊》，2000年4期，頁26-36；韋慶遠，〈張居正與《歷代帝鑑圖說》〉，《歷史》，1997年8期，頁24-29；劉美鴻，〈小皇帝的教科書《帝鑑圖說》及其版畫藝術〉，《國家圖書館館訊》，1998年2期，頁9-11、1998年3期，頁9-13。劉美鴻於其文章中也提及《帝鑑圖說》的藝術風格以及在製作版畫時的一些設計。

9 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65-101; Julia K. Murray,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no.1 (Spring 2006): 20-67. 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Julia Murray, "Keynote Address: Narrative and Visual Narrativ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in Alexandra Green ed., *Rethinking Visual Narratives from Asia: Inter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26. 文中已經提及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彩繪本，詳見下文討論。

10 最有名的便是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而這本書也的確出現在萬曆的日課內容中，詳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74-5。

同時，此書的另一特點便是配有插圖。這些圖畫源自何處？圖畫是不是在文字的言說之外，提供了其他的訊息？如何解讀這些訊息？為什麼張居正要「置入」這些訊息？而作為規諫對象的萬曆又是如何接收這些訊息？規諫的成效到底如何？這些都是本文感興趣並將進行處理的問題。

一、《帝鑑圖說》的編成與版本

(一) 可能的編纂過程

其實，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 1368-1398 在位），就編纂了相當多的鑑戒書籍。而且在他所編的《昭鑑錄》就清楚的分成「善為可法」以及「惡為可戒」的兩大部分。接下來的明朝皇帝也都編有不少類似的書籍。如果是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帝鑑圖說》的編成，似乎頗為傳統。¹¹ 但是，對比之前的明代宮廷編著書籍，《帝鑑圖說》其實相當特別，因為這是一本臣下編給主上觀覽的鑑戒書籍。在此之前也有臣下編給太子的圖籍，但是顯然都未受到重視；嘉靖朝（1522-1566）鄒守益（1491-1562）及霍韜（1486-1540）所呈給皇帝要作為太子講讀用的《聖功圖》，還引起皇帝的震怒，認為是二人有意譏諷。¹²

比起來，此時獨掌大權的張居正所編的《帝鑑圖說》就顯得相當受到矚目。那麼，書中到底有什麼樣的內容來教育萬曆呢？據《明神宗實錄》在隆慶六年十二月己巳日的記載：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大學士張居正率講官進 帝鑑圖說。先是居正屬講官馬自強等考究歷代之事，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從陽數；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從陰數。每一事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取唐太宗以古為

11 此種將善惡併陳的編輯方式，當然並不是明太祖的首創，因為在不少的文獻，都可看到規諫事跡或是圖繪被善惡併陳的記載。不過在明代，他的確是開風氣之先，並且因而影響到後面的許多皇帝。相關書籍的簡要評論可參考永瑤與紀昀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3），卷131，頁11a-12a（793-794）；同時也請參照附錄一萬曆之前，明代帝王主導下所製作的訓鑑類書籍。

12 文獻上就可以看到曾有兩種不同的《聖功圖》，被進獻給明代的帝王。嘉靖時的《聖功圖》之相關資料，詳見嘉靖十八年七月甲午日，《明世宗實錄》，收入黃彰建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4，冊81），卷226，頁6a-b（4703-4）。同時詳見Julia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David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40-2;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9),頁174-6。

鑑之意，名曰 帝鑑圖說。是日具疏進，上展疏朗誦數十語，願謂居正等曰先生每起。於是，居正前近御案為竟讀，已奉圖冊前，上遽起立，目左右展冊。居正一一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其不待指陳，能自言其義者，十居四五。次日報曰，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壑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已又 手諭嘉獎賜金幣有差，自是日置圖冊於座右。每講，輒命居正解說數事，以為常。¹³

這段記錄清楚記載著，在張居正要萬曆開始日講之後的幾個月，《帝鑑圖說》在張居正的主導之下，由眾講官編訂而成。書名取用的是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希望萬曆可以模仿古賢帝王的善行，而能避免重蹈昏君的劣跡。整本書的構成共有帝王嘉行八十一則，昏君暴行三十六則；全書的編排則是每一故事即繪有一圖，圖在前，文在後。圖後所附簡短的文本是節錄自古代史傳原典，再來就是針對原典文本所進行的直解，這部分的文字，較為淺顯易懂，以便能充分闡述故事的內容與其寓含的教訓。¹⁴

雖然有學者把《帝鑑圖說》中所使用的原典都一一詳列，¹⁵但是在比較了眾多明代宮廷所出版編輯之相關的鑑戒書籍，景泰朝（1450-1456）所編的《歷代君鑑》，相當有可能是萬曆諸臣一開始編纂《帝鑑圖說》時，主要賴以參考的書籍。萬曆之前宮廷所編輯過的規諫書籍不少，¹⁶而《帝鑑圖說》與《歷代君鑑》在編輯方式與收錄的內容，似乎都最為接近。兩者經常出現類同或是極為相似的文字內容。¹⁷甚至兩者的書名，也都透露出它們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原來張居正的〈進帝鑑圖說疏〉文中，《帝鑑圖說》其實是被稱為《歷代帝鑑圖說》，這個原本的書名與《歷代君鑑》名稱就頗為類似。¹⁸很可能群臣在一開始編纂此書時，就是以《歷代君鑑》為藍本，或是最主要的參考來源。從中挑選出適當的事蹟，再回頭去檢閱或

13 詳見《明神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1964，冊97），卷8，〈隆慶六年十二月己巳日〉，頁7b-8a（290-1）。

14（明）張居正，〈進帝鑑圖說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103-4。

15 見陳生璽、賈乃謙整理，《帝鑑圖說評注》。

16 詳見附錄一萬曆之前，明代帝王主導下所製作的訓鑑類書籍。

17 有關細部文字的比對，詳見附錄二。

18 見（明）張居正，〈進帝鑑圖說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103-4。不過張居正疏文中的《歷代帝鑑圖說》名稱，在後來出版的《帝鑑圖說》裡，都被改為《帝鑑圖說》。改變的原因不得而知，在之後的官方文獻中，也是以《帝鑑圖說》來稱呼此書。（明）朱祁鈺，《歷代君鑑》，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冊121，頁1-292）。

擷取原典的文字，並對文本加以編輯修動，最後加上白話的解釋，以及進一步闡述文本所寓含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張居正是此書最重要的編纂者，整本書就是在他的強力主導下編成。李維楨（1570-1624）在更晚出版的金濂所刊的《帝鑑圖說》序裡特別指出，除了原來《帝鑑圖說》所載明的馬自強之外還有其他的講官也參與編輯，但是名字卻未被錄進書中，因而引發怨言：「余猶記為圖時，相臣以意授詞臣陶文僖（1527-1574）輩，成之，表上不列諸臣名，眾相顧動色。」¹⁹ 雖然其他的大臣也參與編輯，但從下文的分析中可見到張居正是真正的主導者，控制了圖文所要傳達的訊息。

（二）潘允端本

《帝鑑圖說》原來是手抄且手繪的一本書，不過原書現已亡佚。目前流傳的都是後來刊印，版本甚多。本研究主要談論原書的構成與使用，因此論述中，將以最接近原書的版本作為討論的中心。不過，那一本才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呢？現存大多數的版本都是類似一般的明代書坊刊本，只有一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的版本是以極大的開本印製而成，版框高達 40 多公分，日本學者稱此本《帝鑑圖說》為官版，但是在中國版本學中並無這樣的稱呼，²⁰ 同時從書上的序文得知，此版本是由潘允端（1526-1601）所贊助刻成，²¹ 因此以下將以刊刻者潘允端的姓名來稱謂此版本。

從種種的跡象顯示，這個潘允端本應該是最接近原書的形式。²² 首先是開本的問題，現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徐顯卿宦跡圖》（畫於 1588）中，恰恰重現萬曆皇帝於一五八三年左右舉行經筵時的狀況（圖 1）。在圖中端坐者的便是萬曆皇帝，桌上攤著經筵時所用的圖籍，看起來像捲軸。像宮內廳的潘允端本這樣大尺寸的書籍，翻開來又是圖文對看的裝訂方式，用來給皇帝經筵或是日講都頗為適合。

19（明）李維楨，〈帝鑑圖說序〉，《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50，卷 8，頁 5b-7a（460-1）。

20 感謝臺大中文系趙飛鵬教授的提醒，特此致謝。由於《帝鑑圖說》版本眾多，且刊印狀況複雜。目前關於版本的討論以賈乃謙最為詳盡，參見賈乃謙，〈前言〉，《帝鑑圖說評注》，頁 7-11。本文在此僅將諸多版本做簡要表列，詳見附錄三。

21（明）王宗沐，〈帝鑑圖說序〉，《帝鑑圖說》（萬曆元年，1573，潘允端刊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冊 2，頁 2a-b。目前潘允端本全書所收錄的內容可參照附錄四。

22 關於潘允端本的插圖可參考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 2，頁 35-60。

同時，更有趣的一條線索也透露出這應當是最接近原本的刊本。有關張居正為萬曆講述此書的文獻記錄裡提到，在聽講〈寵幸番將〉的故事時，萬曆指著畫上的建築「勤政樓」問講官說，這樓名取得很好，可是為什麼皇帝卻不在當中勤理政事呢？²³ 由這條記載可知，插畫的宮殿上有著「勤政樓」的牌匾，目前能見到的刻本中，只有這個宮內廳的潘允端本可以看到「勤政樓」的牌匾（圖 2），其他開本或是因為版面太小，或是因為簡略，牌匾上都不曾有「勤政樓」的字樣，可見得潘允端本與原本非常接近，應該就是依據張居正原來進呈的手繪本，或是與手繪本關係密切的模本或刻本所刊印者。

但是這潘允端本又是怎麼來的呢？事實上，也為潘允端本寫有序言的王宗沐（1524-1592）似乎是此版本得以製成的關鍵人物。他與張居正的交情甚深，兩人常常書信往來，²⁴ 不僅討論當時漕運與施政的相關措施，張居正似乎還把王宗沐當成相當知己的朋友，從兩人來回的信件中，可窺見一二。特別是下面幾封張居正寫給王宗沐的信，細讀後，或能解答潘允端本之所從來：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謂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誦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²⁵

在此信中，張居正很直接的跟王宗沐說明自己編纂《帝鑑圖說》的用意，既想要藉由歷史故事來教導萬曆，更希望能夠「早辨防微」，讓自己能免於日後的危難，他說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理解，但王宗沐卻似乎能夠瞭解他的苦心，張居正甚至直接稱王宗沐為其知己者。接下來，他更要求王宗沐在公事閒暇之餘，能夠幫此書「綴之以瓊玖」，使此書能夠「俾永其傳」。雖然在張舜徽所主編的《張居正集》中，編者對「綴之以瓊玖」的註解說是「指王宗沐對《帝鑑圖說》的增補修飾」。²⁶ 但是從書信的上下文來看，當時此書已經呈給了萬曆，而且張居正希望王宗沐可以利用有空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意思是王宗沐尚未進行此事，所以在此，張居正所要求

23 《明神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 98，卷 48，〈萬曆四年三月戊戌〉，頁 2a-3a（1091-1093）。

24 單是現存被刊印在張居正文集中的就還存有不止，詳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2，頁 277、332、398、405、409、437、448、457、517、589、599。

25（明）張居正，〈答河漕王敬所〉，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2，卷 18，頁 398。

26（明）張居正，〈答河漕王敬所〉，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2，卷 18，頁 398。

的，並不是對於《帝鑑圖說》的增補修飾。

那麼所謂的「綴之以瓊玖」到底是指什麼？另一則張居正致王宗沐書信透露了其他訊息：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渙發佳思，冠以雄文。駑馬而先之以拱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為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嫩，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²⁷

張居正說他所編纂的《帝鑑圖說》只是給初學童蒙閱讀的書罷了，但是王宗沐卻為此書而「渙發佳思，冠以雄文」，也就是為此書寫了序跋，張居正信中對於王宗沐的序文多所讚嘆，也多所感謝。事實上，這應該是王宗沐對於張居正前一封信的回應，是張希望王能於辦公餘暇為《帝鑑圖說》「綴之以瓊玖」的結果，相當可能就是潘允端本中刊載的王宗沐所寫之〈帝鑑圖說序〉。

王宗沐不單只是為張居正寫了〈帝鑑圖說序〉，潘允端本的製作很可能也是他在幕後運作的成果，張居正的另一封信寫道：

《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渺，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²⁸

張居正此信的開頭又重複說《帝鑑圖說》只是童蒙書，因而不足以「辱大製」，所謂的「辱大製」到底是什麼？有可能是指之前王宗沐幫張居正所寫的序文嗎？但是前一封信已經就此謝過了，這裡指的是什麼呢？後面張居正開始提到自己所寫的作品，且跟王宗沐說將來如果有閒暇，也許可以將自己的作品給王宗沐指教一番。如果從這樣的上下文來理解，「辱大製」是不是更可能指王宗沐要替張居正印製《帝鑑圖說》呢？在前面的書信裡，張居正就已經表明了希望此書可以「俾永其傳」，雖然信中只是要王宗沐寫序跋，但是希望此書可以廣為流傳的用意卻很明顯，因此，很可能王宗沐不但為他寫序，還替他找到「贊助者」來刊印《帝鑑圖說》。

潘允端的父親潘恩（1496-1582）在這個版本中也寫有一篇頌文兼序來讚頌《帝鑑圖說》的製作，當中有文如下：

27（明）張居正，〈答王敬所〉，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卷18，頁437。

28（明）張居正，〈與王敬所論大政〉，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卷18，頁409。

元輔張少師暨侍從諸臣，采掇堯舜以來致治之跡，可法可戒者，總百十餘條名曰帝鑑圖說以獻，帝命曰俞宣付史館，臣得之流傳，不勝忻忭...²⁹

潘恩提到他得到《帝鑑圖說》，但是並未說明是怎樣獲得，也未說明這是怎樣的版本。到底他得到的是「刻本」，還是原來進呈本的抄模本？

王宗沐的序文中也提及此本刊刻的原由：

潘按察使允端獲公原本，謀刻於淮以傳，而謂沐當序諸末簡...³⁰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獲公原本」是什麼意思？王宗沐此序寫於萬曆元年的十一月，當此時，《帝鑑圖說》仍然是萬曆講讀時的教材，³¹ 潘允端是不可能真的拿到張居正獻給萬曆的那一本「原本」。那麼，此處的原本到底指什麼？

從現存的文獻來看，大約在萬曆元年春夏之間，張居正汲汲於刊刻《帝鑑圖說》，陸樹聲和王希烈在張居正的請求或暗示下，都分別為其寫了敘與後序。同時兩人也都分別指出張居正要刊刻此書的用意。陸樹聲提到：「公復梓其副以揚休美」，³² 意思是指張居正又刊刻了相對於原進獻本的「副本」，來彰顯君臣間的佳話。「其副」一詞，只是指相對於原進獻本之外，另外再刻印出更多本，刊刻的過程如何進行，則沒有更清楚的描繪。³³ 至於張居正所刊的版本，到底是比較接近潘允端的大開本，還是目前看到眾多的較小的坊刻本，也是沒有更多直接的證據可判斷。

不過，這種「以揚休美」的用心，王希烈也講得很清楚：

使當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

29 (明)潘恩，〈帝鑑圖說頌并序〉，《帝鑑圖說》(萬曆元年，1573，潘允端刊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冊1)，頁1a-b。

30 (明)王宗沐，〈帝鑑圖說序〉，《帝鑑圖說》(萬曆元年，1573，潘允端刊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冊2)，頁2a-b。

31 詳見附錄五，一直到萬曆四年三月，官方仍有《帝鑑圖說》被講述的紀錄，因此不可能在萬曆元年時，潘允端就拿到原來的進呈本。

32 (明)陸樹聲，〈帝鑑圖說敘〉，《帝鑑圖說》，頁705-706。

33 Julia Murray 則將其解釋為張居正刻了他手上擁有的「副本」，他認為這個副本應該是在製作《帝鑑圖說》的時候，畫家讓張居正參考的稿本。見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72-76.

及大宗伯陸公敘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³⁴

這裡更清楚地點出張居正刊刻此書的用心，希望「當世士大夫」都知道輔養君德的重要，大家因而可以各司其職，兢兢業業。也就是說，張居正的確是要將刊刻本分送給眾士大夫。

甚至在張居正的書信裡也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他將此書寄給親友：

冗中草復。厚惠概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³⁵

這封信是寄給他的親家友人，張居正在給親家的其他禮物之外，還寄上了《帝鑑圖說》一書，不難想見，他可能將此書也寄給了其他的親友，特別是像王宗沐一樣與他往來親密的友人。那麼這些寄出的書本，應該就是張居正所刊刻的本子。

不過，這個張居正的首刊本到底是何種樣貌？如果是為了刊刻的快速與方便，一般流傳在市面上的刊本大小是比較合適的；如果是為了慎重其事，刊刻出像潘允端本一樣的大刊本，則是更能彰顯張居正的用心。如果是後者，那麼這一本就有可能就是潘允端本所據以刊刻的「原本」，「獲公原本」的意思，就有可能解釋為得到張居正所刊刻的大開本。也許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張居正的首刊本就是如同潘允端本一樣的大開本，那麼為什麼潘允端還要重刻此本呢？其實多刻一套書板，就可以多印幾本，讓此書更加的廣為流傳，就跟古代的善書一般常常希望其他的善男信女加以翻刻，讓更多人得以閱覽。當然此處翻刻者著眼的，應該是想要討好當時正當權的張居正吧？

如果此時張居本的首刊本是較小的版本，那麼潘允端所拿到的「原本」又是什麼？按照上面張居正寫給王宗沐的幾封書信，可以看出張與王的交情非凡。在請求王宗沐寫序跋的同時，張居正有可能請人模了原來的進呈本，一起將這個模本寄給王宗沐。那麼所謂的「獲公原本」，就是得到了來自張居正處的抄模本。無論如何，按照目前的證據來看，王宗沐在這當中似乎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很可能就是他居中牽線，讓潘允端出資刻書，以博得張居正的歡心。

在原來的手繪進呈本已經不存的狀況下，潘允端本是現存最接近原本的刊本。

34 (明)王希烈，〈帝鑑圖說後序〉，《帝鑑圖說》，頁871-872。

35 (明)張居正，〈答藩參高廉全親家〉，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卷18，頁397。

不過，目前的潘允端本也並不完整，前面收錄好皇帝的部分，從第三十九個故事之後，書頁就殘缺不全；後頭的三十六件壞皇帝的事蹟，倒是完整的。而這個不足的部分，卻有可能可以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一套彩繪本來補充。

(三) 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彩圖本

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帝鑑圖說》彩圖本，圖是中國畫家所繪，但是配有手寫的法文文字說明。這套畫冊現在被裝訂成兩冊，封面裝幀硬皮，向左翻頁閱覽，閱讀時左文右圖。不過畫冊並不完整，好皇帝的部分缺了原書排序的第11-20、41、50-54、62則，而壞皇帝的部分則是缺了原書排序的第9、15-18、20、31則。³⁶ 同時，Julia Murray 在他新一篇文章中也注意到這套畫冊，指出了其未按原有順序編排且好壞皇帝參雜出現的狀況。他也指出此書是法國耶穌會士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錢德明（1718-93）從北京寄送給當時法國的財政部長 Henri-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1720-1792），目前圖上都有路易十六（1774-1792 在位）的圖書館印，所以知道這套圖冊後來成為路易十六的收藏。³⁷

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記錄，這套圖冊被斷代在 1700 到 1792 之間，大約是根據收藏者路易十六的卒年作為下限。不過如果以圖冊本身來看，有不少圖的風格相當接近晚明時期的蘇州地區所製作出來的敘事畫風格，也就是所謂的蘇州片的風格。特別像是〈遊畋失位〉這一開的風格（圖3），就跟一批傳為趙伯駒、趙伯驥或仇英所做的〈桃源圖〉的風格相當接近，都是重青綠設色，山石分塊結組方式特意古拙，以便呈現古意。圖冊中有不少開都有這樣的風格，因此，說來就圖畫的部

36 這套畫冊在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被稱為 *Recueil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s Empereurs Chinois*，可於網路下載圖像，詳見該館網頁之相關記錄：《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頁》<http://gallica.bnf.fr/services/engine/search/sru?operation=searchRetrieve&version=1.2&collapsing=disabled&query=dc.relation%20all%20%22cb403581367%22>（檢索日期：2015年10月5日）。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博士告知此筆資料。

37 Julia Murray, "Keynote Address: Narrative and Visual Narrativ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20, note.41-42. Murray 提到這套圖冊可能是要給路易十六的禮物，不過文中並未提供相關的證據。有關此套圖冊是由錢德明寄給 Bertin 的說法也不清楚是來自何處，總之此套圖冊還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相當值得進一步深入的調查。

分甚至有可能可以上推到十七世紀上半的晚明時期。³⁸

更重要的是，若比較潘允端刊本，發現這套圖冊的許多構圖都跟潘本相當接近，甚至畫冊中的勤政樓，也如同潘本一般將勤政樓三字標示出來，圖冊如果有變動也是一些小細節或是背景的更動，並且只有少數幾開是根據當時市面上流通的小刊本之構圖而來，其他就都跟潘本幾乎一樣。這些相同點顯示，這套圖冊可能是直接根據潘允端本或是類似的大開本《帝鑑圖說》版畫之構圖而來。也就是說，晚明的作坊使用了精美的大開本《帝鑑圖說》為稿本，來製作畫冊。由於潘允端本不全，因此，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這套圖冊就成為補充潘本的重要材料，特別是補充好皇帝後面從四十則開始的缺漏，也因而成為瞭解張居正原來手繪本面貌的重要資料。³⁹ 雖然圖冊本身也有缺漏，但是無論如何，這套圖冊因為可以補充許多潘本的不足，而顯得相當重要。

因此，在本研究中，如果是潘允端本有的，就採用這個版本來討論；如果是潘允端本欠缺的，就以法圖的這套畫冊，或者是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之明代郭庭梧刊本為主要依據，⁴⁰ 來進行討論。潘允端本的框高約 40 公分，翻閱時，圖文對看；至於許多其他流傳的明代版本，框高大約 20 多公分，比較接近一般看到的明代書本的大小，⁴¹ 而且因為圖被刻在同一塊木板上，原來完整的圖畫，經過裝訂後從中對折，分隔兩邊，翻閱時只能先看到圖的右半邊，圖的左半邊則需要再次翻閱才能見到，無法同時看到一整張完整的構圖，而且品質也沒有潘允端本這個大刊本來得好。不過，這些萬曆刻本也大約保留了原本的主要構圖、人物分布以及敘事內容。

38 有關蘇州片的研究相當多，多數著眼於晚明藝術市場買賣真偽的問題，見劉金庫，《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頁 93-101，以及 Ellen Johnston Laing, "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 3/4 (2000): 265-295. 近年來也有不少研究開始針對單一作品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例如傅希齡，〈桃源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陳香吟，〈明清〈若蘭璇璣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陳香吟，〈居上林，登十洲——〈上林圖〉考辨與成畫意涵探析〉，《史物論壇》，8 期（2009.6），頁 27-74。

39 目前我只能根據網路上的材料來討論，有關風格的部分，還有環繞此圖冊的其他相關問題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

40 詳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冊 14）。使用這個刊本主要是因為小型刊本大致類似，而此本是少數有整本複製的版本。

41 除了潘允端本之外，其他版本的圖框大約都是 20 多公分。相關的版本的論述，詳見賈乃謙，〈前言〉，《帝鑑圖說評注》，頁 7-11。

二、《帝鑑圖說》的內容與編排

那麼，張居正編纂《帝鑑圖說》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麼呢？之前類似的書籍已經不少，為什麼他還需要另外一本歷史書來教導萬曆呢？此書的目的，真的只是單純的教育聖君嗎？所謂的聖君又需具備什麼樣的德行呢？他又是如何詮釋這些歷史故事，來達成他特定的目的呢？

在萬曆登基後的前三、四年，《帝鑑圖說》幾乎是宮廷內最重要的一本書。從各種相關資料顯示，此書在隆慶六年底編纂完成，獻給萬曆之後，便作為講讀的重要用書。目前可以查到的就有八次講讀此書的記錄，時間從萬曆元年一直到萬曆四年三月左右。翻閱《萬曆起居注》或是《明神宗實錄》，可以看到萬曆在位的前十年，沒有那一本書像《帝鑑圖說》一樣，被如此頻繁地記載著，而且有時連講讀的大段對話內容也被記錄下來，充分顯示講讀此書的重要性。⁴²

其實就連明代人也早已注意到此書對萬曆的影響，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中就明白指出此書的重要性：

今上以沖聖御宇，張江陵相公進《帝鑑圖說》以勸講，內列「聖哲芳規」、「狂愚覆轍」二項，以寓勸戒。上固天縱，自是益勤史學，更命進講《貞觀政要》。……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為法，自沖年即有小世宗之號，然亦繇《帝鑑》一書，啟沃聖心，故孜孜講究不輟。⁴³

（一）聖哲芳規

張居正要從眾多的君王事跡中選取出 117 則故事，他依據的標準又是什麼呢？《帝鑑圖說》裡有關好皇帝的部分自堯開始，結束於宋。對於張居正而言，三皇是太過遙遠的過去，且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真的存在，所以他並沒有把這些古老傳說的帝王放進去。⁴⁴於是，此書開頭的第一個故事便是堯的〈任賢圖治〉故事，原典文本只是說明堯如何任命諸臣輔佐其治理天下，而張居正在後面解讀的文

42 相關的講讀記錄，詳見附錄五、六，同時在張居正給友人的書信中，也可見到他多次提及此書，相關資料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2，頁 397、398、409、430、437。

43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頁 800-1），補遺，卷 1，今上史學條。成書於 1606、1619；現代重印本。

44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 769-773；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第四章，頁 73-9。

字則進一步闡述：

蓋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雖以帝堯之聖，後世莫及，然亦必待賢臣而後能成功。……其後帝舜為天子，也跟著帝堯行事。……所以古今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賢圖治之效也。⁴⁵

連聖君堯都必須要依靠賢臣才能治理天下，而且一旦有了賢臣，作皇帝的便可以垂衣而天下治。此段解說，清楚強調了任命賢臣的必須性與重要性。⁴⁶

又譬如說「丹書受戒」這個故事，周武王（ca. 11th c. B.C.）向姜太公請教能讓天下長治久安的秘訣，姜太公則要他先齋戒三日。三日之後，姜太公還要周武王不得以帝王之姿來接受「丹書」，於是「王遂東面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周武王完全不顧其帝王之尊，恭恭敬敬的自其臣下手中，接取教誨。有趣的是，同樣出現在《歷代君鑑》裡的這個故事，並未提到姜太公要周武王齋戒三日，也沒有要他不能以南面來接受「丹書」。事實上，有關齋戒與東西向授受「丹書」的記載出現在較早的文本中，在《歷代君鑑》裡被刪減，而到了《帝鑑圖說》又回復到原來的樣貌，張居正顯然是特意強調即使是君王也要敬重其師長，聽從師長的教誨。⁴⁷

從《帝鑑圖說》與《歷代君鑑》講同一故事卻各自強調不同重點來看，《帝鑑圖說》的編輯方式很可能是以《歷代君鑑》作為初步故事選擇的範圍，在決定了適當的故事之後，編纂的群臣就溯源找到原來的出處，並擷取他們認為恰當的部分，或者，更準確的說，張居正要特意強調的部分。

如果說第一個「任賢圖治」的故事，清楚設定了整本書的基調；那麼帝王嘉行的最後一個故事，則充分展現了君臣之間的情義。〈燭送詞臣〉故事講的是蘇軾（1037-1101）在宋哲宗（1086-1100 在位）時，又重新回到北宋宮廷任職，有天晚上，宋哲宗的祖母宣仁高皇后（1032-1093）與哲宗同時召見他，並且問他知不知

45 《帝鑑圖說》的相關文本，可以參照現代影印出版的版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14，頁 713-4。

46 有學者將《帝鑑圖說》中的道德教訓分門別類來討論，認為一共可以分成 17 種重要的道德教訓，見牛建強、汪維真，〈從《帝鑑圖說》看十六世紀末的中國帝政〉，頁 26-36、30。雖然的確可以歸納出 17 類的道德規範，但是在《帝鑑圖說》書中，最被強調的仍然是任用賢臣與君臣之義的部分。

47 （西漢）戴德，《大戴禮記》，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經部 12，卷 6，〈武王踐祚〉，頁 30-31。

道為什麼再度回到宮廷卻能升遷如此之快？蘇軾回答說應該是太皇太后與哲宗的恩典，不過太皇太后卻告訴蘇軾：「非我用卿，乃先帝神宗意也」。太后於是將神宗如何欽慕蘇軾的文采告知蘇軾，蘇軾因此追感先帝知遇，不覺痛哭失聲，哲宗與祖母也同感悲傷哭泣。之後，太皇太后賜蘇軾座位又賜予茶飲，並且在最後撤下御前的金蓮燭，送他回到翰林院當值。緊接著故事本文之後的直解文字評論道：「看那時人君接見臣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藹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為臣的，感激主恩，不覺悲泣。君臣間是何等景象。」⁴⁸而張居正作為隆慶皇帝死前所指定的輔政大臣，也似乎以這樣的故事來暗示他的忠心與感遇之心，也表達了謝意，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充分彰顯了君臣融洽相處的價值與楷模。

（二）狂愚覆轍

那麼壞皇帝的部分又使用了那些故事呢？對張居正而言，如何讓萬曆知道，那些行為是昏君的行徑，日後必須戒除是最重要的。一開始的第一個故事說的是夏朝的太康無道失國，因為太康喜歡打獵在外巡遊而不理政事，終於因此而失國。此類耽於逸樂，因而失國的例子還有周穆王駕著駿馬四處巡遊不思返國、漢成帝不在宮中理朝卻好微服在市街上遊蕩，以及隋煬帝遊幸江都的事例，都成為值得鑑戒的故事。其實在萬曆之前的明武宗就十分喜歡四處遊玩、甚至親自對外征戰，而萬曆的父親明穆宗也被說是「頗好遊而重武」，⁴⁹顯然張居正要當時年僅十歲的萬曆注意，即使是貪玩也可能因此而誤國，加上前朝的事例，似乎讓張居正不得不特別的加以強調。

夏商周三代的昏君像是桀、紂都赫然在列，而且是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諸如酒池肉林或是妲己惑主一類的故事。女禍當然是重要的主題，而且女禍往往也伴隨著奢侈頹廢的生活型態，歷史上常見的傾國尤物諸如妹喜、妲己、褒姒、飛燕、合德都一一在列。這些女人不但蠱惑人君，也遺害社稷，終於導致國家滅亡，因此在這些故事的最後，往往是充滿勸誡的言語，譬如在〈妲己害政〉的故事最後，文章的直解說道：

史說商紂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使其有此才智而能親近賢臣，容納忠言，則其惡豈至於此哉？乃醜鄂侯剖比干，而唯婦言是用，欲不亡得乎？萬世

48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頁817-8。

49 (明)王世貞，〈張居正傳(上)〉(原收入《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4，頁440。

之下，言大惡者，必曰桀紂。女禍之烈，一至於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⁵⁰

這些「可不戒哉？」或是「可不慎哉？」的語句，充滿在昏君的故事後面的解說中，都是要萬曆將來不可重蹈覆轍。這也是這部分故事開頭大標題所標示的「狂愚覆轍」的意涵，這些狂愚的行徑都是覆轍，絕對不允許再度重蹈。

另外還有一些故事值得注意，其中一則是漢成帝時寵幸外戚，以致釀禍的事例，被稱為〈五侯擅權〉，講的是漢成帝剛繼位就大封其舅家，王氏一門大權獨攬，最終導致王莽篡位。有趣的是，故事最後的勸告卻有著循循善誘的語氣：

成帝不思祖宗貽謀之意，乃使諸舅更執國政，子弟分處要官。至於驕縱不法，一切置而不問，養成篡弑之禍，豈非千古之鑒戒哉？人主欲保全外家，惟厚其恩賚，而毋使之干預朝政，則富貴可以常守矣。⁵¹

在較為嚴厲的「豈非千古之鑒戒哉？」話語之後，突然加上了幾句，彷彿就是直接對萬曆說的，如果想要你的舅家長保富貴，那麼就不能讓他們參與朝政。而且與其說是對著萬曆說，其實也似乎針對著萬曆的生母李太后而說者，因為當時的李太后的父親確實是有驕縱的狀況，張居正不得不在此先「防患於未然」。但是，後面的幾句話說得語重心長，幾乎就是一帖保平安的萬靈丹藥，終萬曆朝，外戚的確也不曾為患，一方面當然是李太后十分的克制，另一方面張居正的教導，應該也有相當的成效。

三、杜漸防微：鑑戒的成效

萬曆五年，也就是一五七七年，張居正父親過世。按照制度，應回鄉守孝三年，但是萬曆卻要張居正繼續輔政，而提出了「奪情」之說，張居正因而遭到許多人的攻擊。⁵² 當時，在幾則疏言中，張居正跟萬曆說，許多對他的攻擊，其實全是政治上的考量，藉口他不肯回家守喪而攻擊他，但其實是由於他對萬曆的忠誠，因

50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頁826-7。

51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頁835-6。

52 有關這段期間的原委，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一章。

而得罪了許多人。⁵³ 在上給皇帝的另一則疏文裡，張居正表達了自己的忠心，更記錄了萬曆對他當時處境的同情與支持：

又昔承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為國，不能曲徇人情，以致叢集怨讎，久妨賢路。今日若得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伏蒙上諭：「先生精忠為國的心，天地祖宗知道，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羣姦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祖宗的法度處治他，先生不必介懷。欽此。」⁵⁴

一五七八年，萬曆大婚之後，張居正終於要暫時返家幾個月，以便處理父親的喪事。雖然皇帝不捨得張居正離開，但是礙於輿論，還是讓他返鄉。臨走前，與萬曆有過一次聚會，張居正詳細地記錄了此次的會面：

先是有旨，令臣以十一日，詣文華殿面辭。是日，上御文華殿西室，召臣入。致辭云：「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裡及銀記一顆。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軀難報。」上云：「先生近前來些。」臣至御座前。上諭云：「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只因先生情詞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⁵⁵

如果張居正沒有誇張，這段對話充分顯出萬曆對其倚賴甚深，張居正接著記下了他趁機對於剛剛新婚的萬曆皇帝的諄諄叮嚀，顯然十分擔心自己不在萬曆身邊，不知皇帝日常起居是否得宜，而萬曆接著答覆道：

上說：「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奏：「臣屢荷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宮門前叩謝，伏望皇上為臣轉奏。」上又說：「知道了，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臣仰荷聖慈憫念，不勝感戀，伏地哭泣，不能致謝。上云：「先生少要悲痛。」然天語未畢，亦哽咽流涕。臣叩頭而退。上謂左右云：「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隨著人奏之聖母，聖母亦感痛。差管事牌子李旺，賜銀八寶六十兩，途中賞人。又

53 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285，356。

54 (明)張居正，〈謝召見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290-1。

55 (明)張居正，〈召辭紀事〉，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332-3。

口傳慈諭：「先生既捨不得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欽此。」⁵⁶

上述對話情真意切，充分顯出張居正與萬曆母子間的親密情狀，這種君臣相處，互感恩情，別離時相互對泣，有如家人般融洽的景況，就與前述《帝鑑圖說》書中的〈燭送詞臣〉君臣間情感交融的故事一般，也許萬曆在與張居正話別或也曾思及之前所講述過的故事？即便，萬曆不曾在話別時想到這個故事，《帝鑑圖說》書中的其他故事，其實在這次的「奪情」事件中，有著重要的影響。

雖然這段期間，張居正遭到許多人的攻擊，但是萬曆母子對他的支持，似乎並未稍減。張居正應該相當慶幸，自己當初對於萬曆的教導在此時似乎有了成效。萬曆面臨針對張居正而來的眾多指控，處理得宜一如他曾經讀過的《帝鑑圖說》裡〈明辨詐書〉一文中的漢昭帝（86-74 B.C. 在位）。在這則故事裡，年方十四歲的昭帝初登基，卻能明辨假造事實的奏本，判定當時的顧命大臣霍光（？ -67B.C.）被人陷害，且面對眾多流言與疏文彈劾，卻能獨排眾議：

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即發怒說：大將軍是箇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即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為賢主。或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託孤寄命，豈易事哉？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最後兩句：「託孤寄命，豈易事哉？」，雖說是書解的評論，更是張居正的「夫子自道」，他的狀況與「受先帝所託」的顧命大臣霍光頗有相近處，選擇此則故事，將其置於《帝鑑圖說》裡，張居正似乎早就看到自己身掌大權，可能招引來的莫名禍端。也就如同《明神宗實錄》所記載的，張居正是「受顧命於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⁵⁸萬曆之所以能「悉心聽納」，未嘗不是張居正在萬曆年幼的時候，便已教導他如何

56（明）張居正，〈召辭紀事〉，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332-3。

57（明）張居正，〈明辨詐書〉，《帝鑑圖說》，頁744-5。張居正也在其他的文章中提到相同的論點，詳見（明）張居正，〈雜著（第十二則）〉，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654。

58 相關記錄見《明神宗實錄》，卷125，〈萬曆十年六月丙午〉，頁5b-6b（2334-2336）。

明辨虛實，瞭解顧命大臣的為難處境。此次「奪情」事件的結果，正顯現張居正深謀遠慮的成效。

對於自己身處的危機，張居正早就有所警惕。在他之前的首輔大臣起起落落，久居宦場的張居正，除了深慶得到一展抱負的機會，更知道官場之險惡。隆慶六年冬，時當萬曆甫登基半年，張居正就書函給友人，提到自己現在的處境，認為萬曆對他的信任，甚至超過周成王（11th c. B.C.）對周公（？-1095 B.C.）的信賴：

所幸主上年雖冲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加也。⁵⁹

但是他更清楚自己處境的艱難，特別是要如何維持此種君臣間的信賴，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萬曆元年，張居正在給王宗沐的信上提到了他之所以要編輯《帝鑑圖說》的原因：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不能得之於意表也。⁶⁰

這段文字很清楚的顯示，張居正確實是相當有意識的在編纂此書，甚至也跟他相當知心的友人提及此事，特別是提到「因事納誨，早辨防微」，他當然知道伴君如伴虎，要怎樣才能確保君王的信任又不會因權招嫉呢？即便讒言紛至，怎樣才能讓君王瞭解這些都是因嫉而生恨的呢？顯然《帝鑑圖說》的編纂與講解便是他所設想出來的方法。

另一件事，也可看到張居正的苦心經營沒有白費。就在張居正要出發回鄉前，萬曆賜給他一些路費與禮物，當中最特別的是一只印記，在張居正謝別萬曆的疏文中記載：

茲者，蒙准給假，辭行有日。仰荷天恩，特降手諭：「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帝賚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外奉聖母慈命，賜先生路費五百兩，紵絲六表裏。朕賜亦同。先生欽承之。故

59（明）張居正，〈答兩廣殷石汀〉，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頁330。

60（明）張居正，〈答河漕王敬所〉，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頁398。

諭。欽此。」并龍箋敕諭一道，「帝賚忠良」銀記一匣，銀池鑰匙全。該司禮太監王臻，恭捧到臣私寓。⁶¹

萬曆以及李太后其實賜給張居正不少金銀帛物，但是張居正卻特別標出此記。萬曆給的這只銀記，可以讓他直接封書上奏，確實是特別的恩賜。無怪乎張居正要詳細的紀錄此銀記被裝在匣中，特別由司禮監太監送達等等的細節。但是詳閱疏文的後半段，方知其重要性還不止於其功用，更重要的是印文其實寓含著師生兩人所共同瞭解的象徵意涵：

至於圖章篆記之頒，雖先朝間有；若乃取義命詞之重，則往牒希聞。昔傳說之輔商宗，是稱帝賚；若魏徵之對唐帝，曾辯忠良。豈如一介孤踪，兼備二臣盛美。⁶²

張居正清楚的指出，雖然過往可能也有主上賜給臣子印記，但是萬曆所賜之銀印記意義之重大，卻是前朝所罕見，接著他就分別解釋了「帝賚」與「忠良」的意義。所謂的「帝賚」指的是商高宗（fl. 14th c. B.C.）找尋賢相的故事，高宗因為望治心切，感動上天，一日夢見上天賜給他賢能的宰相，醒來，他便把夢中所見請人繪為肖圖，派人至各地尋訪，找到了當時正在築牆的工人傳說（fl. 14th c. B.C.），相與談論政事，果真是賢人，後來也就在傳說的輔佐下，加上高宗「從諫好學」，於是促成了商朝的中興。⁶³ 而所謂的「忠良」指的是唐朝的賢相魏徵（580-643），魏徵與唐太宗（626-649 在位）可說是中國歷史最著名的明君賢臣典範，由於魏徵的屢屢直言勸誡，太宗才能開創出唐朝的鼎盛。⁶⁴ 在《帝鑑圖說》書中，光是唐太宗的事蹟就有十三則，是所有的帝王中最多的。而講述太宗與魏徵兩人互動的事蹟就有五則，是整本書中講述最多的模範君臣。很明顯的，張居正似乎特別欣賞兩人所立下的典範。

其實在萬曆初登基，張居正將《帝鑑圖說》進獻給萬曆時，就已經將自己比擬為魏徵了：

61（明）張居正，〈謝賜敕諭並銀記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329。

62（明）張居正，〈謝賜敕諭並銀記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329。

63（明）張居正，《帝鑑圖說》（聖哲芳規，no.10），頁724。

64 書中有關太宗與魏徵的故事，見（明）張居正，《帝鑑圖說》（聖哲芳規，no.42，44，46，47，48），頁766-7、768-9、770-1、772、773-4。

伏念臣猥以迂疏，謬蒙知遇。雖無伊尹致其君必為堯舜之學，實有魏徵勸其主力行仁義之心。故每因事以納忠，蓋以責難而為敬。⁶⁵

可以想見在《帝鑑圖說》講述的過程中，張居正應當是相當仔細地剖析過太宗與魏徵兩人間的互動，點出魏徵的忠心就是展現在時時提醒太宗的缺失上，使太宗能知己身之過，終成一代明君。貼心的萬曆，以「帝賚忠良」的銀印記賜給張居正，用的就是之前所講述過的明君賢臣來比擬兩人關係，一方面顯出萬曆對張居正的褒獎，一方面也顯出《帝鑑圖說》的講述確實對萬曆有著重大的影響，連讚美張居正的典故都是出自此書。當張居正收到此印記時，應該覺得之前的苦心，沒有白費吧？

顯然張居正當時在編纂此書時，的確有特殊的意圖。以古代帝王聖賢的故事為引，無論是故事本文的擷取或是評論本身的闡述，都是針對帝王的某些重要範行而作，首先是論及任用賢能的重要，又特別突顯君臣間的仁義，讓萬曆得以放心的將國事交與他。進而談到輔佐帝王的艱辛，特別是強調輔佐幼主之不易，提早為自己可能因為獨掌大權而招來的嫉恨與讒言做準備。萬曆在「奪情」事件的回應，也證明了張居正的「洞燭機先」確實在重要時刻發揮了功用。在萬曆的前十年，萬曆與張居正君臣的關係大多數的時候是相當和諧的，而張居正所享有的權力，也的確是前朝所未有。也難怪連沈德符都認為早年《帝鑑圖說》的講述，確實對萬曆後來有著莫大的影響。

四、帝鑑插圖的構成

(一) 自圖像傳統而來

《帝鑑圖說》另外一個令人矚目的便是當中配有許多精美的插圖，從現存最近似原本的潘允端刊本可以想見手繪本的狀況。明代之前，宮廷所用鑑戒書籍配有插圖的例子，目前只剩下記載，實物多已不存。⁶⁶ 明代在萬曆之前，則已出現過兩本圖文相配特別給皇太子講讀用的教科書。有趣的是這兩本書都被稱之為《聖功

65 (明)張居正，〈謝銀幣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115。

66 清代宮廷曾發下一本元代王惲(1227-1304)所作的《承華事略》鈔本一冊，著南書房翰林把每段文字根據意義配圖。據四庫群臣所考，此書在元代原有圖，但是清宮所收版本為後世之鈔本，故無圖。因而此書為元代少數配有圖繪的皇家童蒙之書，然而今所存者則為光緒時重新補圖的本子。詳見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冊14)。

圖》，一本成於弘治八年（1495），由大臣鄭紀（1438-1513）所上，另一本則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由鄒守益（1491-1562）和霍韜（1487-1540）共同進獻。⁶⁷可惜二書今均不得見，無從詳知其開本大小或是圖文相配的實際狀況。只知道其中一本《聖功圖》冊被「飾以金碧」，也就是上了相當濃豔的顏色。⁶⁸不過在相關資料中，都不曾見到《帝鑑圖說》原書有施以顏色的記載，或許張居正並未使畫家上色？如果以張居正編此書的時間緊迫或是以其教化意味為重來看，或許《帝鑑圖說》原書所配圖繪很可能是白描插圖？以目前有的資料無法做更進一步的推斷。

無論如何，為了教育萬曆費盡苦心的張居正，連圖像的製作都相當在意，特別嚴加控制。王希烈（1553年進士）在《〈帝鑑圖說〉後序》就指出：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傳。……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襄贊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議與宮保呂公言：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而後成之。⁶⁹

因此，張居正不單只關注《帝鑑圖說》所收聖王暴君歷史故實의 文本內容，連圖像的製成，他都嚴加掌控，所以王希烈才會說「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

帝王聖賢肖像圖繪在中國有相當悠久的傳統，而且常常把聖王暴君並列而繪，觀者也往往會從這些並列的聖王暴君得到啟發，最有名的例證便是曹植（192-232）所說：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

67 (明)沈德符,〈宗藩/聖功圖〉,《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冊1,頁102-3),卷4。有關這兩本《聖功圖》的討論,詳見Julia Murray,“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240-242;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9),頁174-177。

68 謂的「飾以金碧」, Murray 推測可能接近同時代崇善寺畫卷,與西藏地區佛教繪畫所使用的顏色接近,詳見Julia Murray,“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240 and note.31。本人則發現另一本很可能是明代宮廷所製作的手繪書:《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書中插圖設色豔麗,重彩加上泥金上色,嘉靖的《聖功圖》似乎也可能以這樣的風格製作,此書目前上卷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下卷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現代複製品可參見:(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臺北:世界書局,2009,據明代內府刊本複製),卷上;(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北京:北京圖書館,1998,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內府彩繪插圖本複製),卷下。

69 (明)王希烈,《〈帝鑑圖說〉後序》,收入《帝鑑圖說》,《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14,頁871-2。

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嘆息；見媼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⁷⁰

曹植此段觀畫的感想便是在觀覽了明君忠臣、暴君奸臣等併陳的圖像之後所發出的感想。「觸目生感」確實是圖畫在宣揚教化理念時，相當重要的功能。這些寓教化於帝王聖賢或奸臣孽子肖像的圖畫，被繪製在許多地方，目前現存最多的便是東漢時期的畫像石磚畫。⁷¹ 這些圖像也會被圖繪成宮殿壁畫，只是古代建築多已不存，現在可見的製作則有《歷代帝王圖》或是如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畫屏風上圖繪的列女孝子故事。⁷² 有些帝王肖像或是聖賢故實則被刊刻上石，成為碑版，或再被拓印流傳。⁷³ 因此，想要獲得此類的圖像並不困難。特別是在明代中期以後，印刷出版業越來越發達，此類圖像更是隨手可得。因而，當負責《帝鑑圖說》插圖的畫家開始要繪製這些圖像時，其實是應該有不少的材料可資參考。

更何況明代宮廷從很早就有不少像三國故事一類的繪畫被製作，這些畫既可裝飾宮廷，也能作為皇族教育的材料，譬如由商喜所畫的〈關羽擒將圖〉就是典型的例證。⁷⁴ 負責《帝鑑圖說》插圖的畫家，要在短時間完成一百多幅插圖勢必要善加利用手邊能夠獲取的圖像資料，或是直接使用，或是將圖像改動以配合文意的要求。

就以〈君臣魚水〉這個故事的插圖（圖4）為例，⁷⁵ 此則是有關劉備（162-223），關羽（160-219）和張飛（?-221）一同去拜會諸葛亮（181-234），三顧茅廬要敦請諸葛亮為其擘畫軍國大業的故事。潘允端本的插圖，就跟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70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敘畫之源流〉,頁11。曹植此段話常被引用作為圖像具教化功用的例證; Julia Murray 也將此段話譯成英文詳加解釋: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81.

71 有關武梁祠畫像,詳見 Wu Ho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2 有關這些規諫畫作的討論,詳見石守謙,〈南宋的兩種規諫畫〉,《藝術學》,1期(1987.3),頁7-39。亦可參閱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73 有關這些拓本跟線刻畫詳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9冊:石刻線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1989)。

74 這張畫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版詳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第6冊,圖81。荷蘭萊頓大學的 Oliver Moore 教授也曾針對這幅畫多層次的視覺意涵有詳盡的剖析,詳見 Oliver Moore, "Violence Un-scrolled: Cultic and Ritual Emphases in Painting Guan Yu," *Arts Asiatiques* 57 (2002): 86-97。對於 Moore 教授告知並贈與此文,深表感謝。

75 (明)張居正,〈君臣魚水〉,《帝鑑圖說》(聖哲芳規,第三十五則),頁757-8。

歸於李迪名下，但可能是明初宮廷畫家的作品〈三顧圖〉（圖5）似乎頗有關聯。⁷⁶雖然乍看之下，因為潘本幾乎是正方形的構圖，而〈三顧圖〉是橫長式的構圖，⁷⁷兩者似乎並不特別相像。但是仔細比較圖上形象，有多處相當接近：圖畫的中間都有一條河流從巨大的岩石後方流出，由畫面右上貫穿至左下，藉由這條河流將畫面場景分隔為二，同時都有坡石樹木從畫面的右下方向中間延伸，在畫的下方形成一種框架的效果。而且如果將潘允端本的幾乎正方形的構圖從中橫切，將上下兩部分拼成左右開展的長卷式構圖（圖6），應該可以更清楚看到兩者間在構圖上甚為相似之處。同時，劉備三人被安排在河的右方，跨過河上的石板小橋，就可到達左方（或是左上方）的諸葛亮的茅廬。當中均有持帚小童，前來探問訪客的來意，右下方的樹石處則有劉備帶來的隨從與鞍馬，顯示劉關張三人自遠處前來拜訪。這許多雷同處，似乎顯示當時負責製作《帝鑑圖說》插圖的畫家，應該是參考過像〈三顧圖〉這樣的宮廷繪畫，⁷⁸來製作這些插畫，雖然因為形制的不同，而將構圖做了些微的調動，但是對照之後，仍可以看到其間因循改動的關係。

其實，原來這幅可能是做於明初宮廷的〈三顧圖〉，或許是依循了類似收於《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以下簡稱《全相三國志平話》）中的的版畫，⁷⁹或其他類似的早期繪畫，再加以變化而來。《全相三國志平話》中被標為〈三顧孔明〉的版畫（圖7），畫面上右邊同樣有著一條自岩石群中流貫而出的小河流，孔明的茅屋也被安置於岩石邊上，不過劉關張三人所在的較為寬敞的空地卻是在土橋之後，不像上面兩張畫的處理，空地都在小橋之前。但是與〈三顧圖〉相同的是，三人來到孔明的茅屋前，小童正打開短籬門詢問三人的意圖。《全相三國志平話》中劉備拱手向前但又回身左望似乎正在諮詢關羽的意見，關羽則是側身拱手，似乎在回應劉備甚至是回答詢問的小童，站在最後的張飛則是微側幾乎正面而雙手扶著腰帶。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人的姿態，其實也被用於明初宮廷的〈三顧圖〉，同樣站在最前面的劉備雖然沒有拱手卻也是回身左望，中間微側正面而雙手扶腰的則是關

76（傳）李迪的〈三顧圖〉圖版，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冊2，頁59-60。這張〈三顧圖〉岩石上的皴法頗為制式，原來用來表現山石紋理以及石頭量感的筆法顯得鬆散，某些地方甚至有些平板，但是人物的神態與動作卻表現得相當細膩，或許是明初喜歡圖繪三國故事的宮廷畫家所為？

77 雖然這張畫現在被裱為軸，但是整體的構圖卻比較是橫長左右取向，而非縱長的上下取向的構圖方式。

78 另有一張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戴進的〈三顧茅廬〉也有相當類似的構圖，可見這類的繪畫在明代應該相當常見。

79 相關圖版見《三國志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冊169，據日本東京公文書館之內閣文庫藏本影印）。

羽，一把長鬚突顯出他美髯公的稱號，側身背對觀者的則成了張飛，畫中三人的姿態都可在《全相三國志平話》找到雛形，只是有所改動。畫家將關羽以幾乎正面的姿態呈現，似乎要更加突顯他的重要性，也許與關羽信仰的盛行有關？整體言之，明初宮廷的〈三顧圖〉似乎為讓空間更加可信，改動了《全相三國志平話》的構圖，但是保留有圖上的幾個基本元素，也改換了劉關張三人的手勢，人物的身姿雖然有所調動，但是基本原則仍相同，這些都顯示前者確實很可能是參考了元代版畫所製成。相較之下，《帝鑑圖說》插圖則與〈三顧圖〉的關係較為密切，特別是整體的構圖與小河上的石板橋，甚且是劉關張三人的相對位置的類同，都顯示《帝鑑圖說》插圖製作時，很可能參考了〈三顧圖〉這一類的明代宮廷繪畫。

雖然《帝鑑》的〈君臣魚水〉插圖借用了〈三顧圖〉繪畫的構圖和母題，但是兩者所強調的重點卻並不一致。版畫裡的劉備不但拱起雙手還微微屈著身子，恭敬地跟持帚的童子致意，顯出他求賢若渴的誠意，一旁的關羽和張飛則似乎頗有微言，張飛甚至舉起手來作勢要阻止什麼。兩人的姿態恰與劉備的恭謹形成對比，描繪了劉備不顧其他二位弟兄的不滿，仍然執意要敦請諸葛亮出山相助於他。反看〈三顧圖〉中，童子已經要出來應門了，但是劉備仍然回身跟關張兩人對談著，似乎在討論著什麼，此畫似乎要強調的是故事裡三人為敦請孔明時的某種爭執，畫家選擇了故事裡的另一個高潮來圖繪。如此，更對比出〈君臣魚水〉版畫裡特意要突顯劉備禮賢下士的謙卑姿態。也就是說，《帝鑑》的插圖雖然使用了舊有的繪畫圖像傳統，但是卻將焦點轉移至帝王當有的範行，以便傳達張居正所要的圖畫意旨。

潘允端本插圖的繪稿風格也頗為接近明代宮廷畫家的作品，特別是在母題使用與構圖佈局上。如果比較幾張也是以宮殿或是建築為主的畫軸，可以看到《帝鑑》的插圖風格的確跟明代宮廷繪畫有關。例如周文靖的〈歲朝圖〉（圖8）為例，雖然是長軸，但是如果只看下半段建築群集中處，畫面左下方有坡石斜切而入，坡上則有樹叢向上生長，呼應著右方稍遠處類似的樹石母題，在兩側樹石坡腳的錯落掩映中，三位騎馬的官員正要往中間的屋舍前進，帶出全畫最主要的焦點：高牆框圍出屋舍儼然，有些在大門處的官員正要陸續進屋，屋中的正堂裡相互拜年的官員點出了節慶的氣息。類似的母題與構成的場景，如屏障於畫面下方或左或右的坡石及樹叢，儼整的屋舍建築與高高的圍牆，屋前站立伺候的僕從，故事開展主要舞台的正廳等等，也常常出現在《帝鑑》插圖中。

(二) 單元組構與生動想像

雖然《帝鑑》插圖繪者可以找尋相關的圖像來製作插圖，但是要在短時間內完成 117 張圖畢竟不容易，特別是許多場景都在宮殿之內。因此，畫家便採取在中國的工匠傳統中常見的手法：以個別的小單元，交互組合，組構成許多不同的變化，即使是常在邊角處出現的樹，只要樹種不同，或是跟坡石一起出現，或是以雲襯底，就可以有不少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再配上其他建築上的小單元的變化，例如是三開間的大門，或是單門，重簷或單簷的屋頂，庭園裡有樹或是其他的擺設，就又組成許多看似類同卻又不盡相同的場景。這種方法就頗為類似雷德侯所稱的「模件系統」(module system)。不過，這些繪畫上的母題或是成組出現的母題並不是如同建築模件一樣具有標準化的特性，我傾向稱呼這樣的方法為單元組構法，以便強調這些個別的小單元可相互置換與重組的特性，但又不像建築模件一般的標準化而有著更多的彈性與變化。⁸⁰

而這種作法又以用來表現模範帝王的故事時最常見，因為這些勤政愛民的君主，日常的作息就是在宮中處理政務，因此場景也最常出現在宮中的正殿。所以，書中最常看到的便是以單元組構的方式來變化的，譬如說〈德滅祥桑〉(圖 9；1-9) 的場景就跟〈葺檻旌直〉(圖 10；1-28) 很接近，皇帝處理政事的宮殿被置於畫面的右上方，下方則通常有橫貫畫面的且與正殿建築平行的宮牆與宮門，上下間再以宮道連結，而畫面的右下方也常畫有坡石與樹木做為一種屏障，整個畫面建築與配置形成一種相當穩定的三角形。上述的兩景，主要的構圖幾乎沒有差別，仔細比較則可發現〈德滅祥桑〉在庭中多了幾棵樹，〈葺檻旌直〉則是在步道以及欄杆的部分多了許多細節的刻畫，其他還有些小小的添加與變化。

即使有戶外的場景，也多是跟祭祀有關，或是為了訪查民瘼，而進到荒郊或城鎮。譬如〈下車泣罪〉(圖 11；1-5) 跟〈澤及枯骨〉(圖 12；1-11) 都是郊外的場景，兩者的構圖配置相當類似，右下方都有樹石，前景均為空地，只有遠景有較大的不同，充分顯出使用單元組構方式可以很容易組出許多不同構圖的便利性。同一類的單元可以置換，即使是非常相同的作法，也可以因為某些人物或是細節的添加，而讓畫面有所變化。事實上，〈諫鼓謗木〉(1-2) 幾乎就跟〈揭器求言〉

80 雷德侯教授在他的書中詳細地討論了他的理論，他認為中國人發明了這套利用標準模件來組構物品的生產系統，他稱之為模件系統 (module systems)。詳見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相同，⁸¹ 不管是宮殿的配置或是人物的位置，都幾乎一樣，只有後者多了一個人在宮門前偷看，而且還多了三四樣的樂器，透過這樣的處理，觀者不會馬上意識到兩者間極端雷同。

如果根據完整的《帝鑑圖說》版本統計畫面的構成，在好皇帝的 81 張插圖中約有 15 張有宮殿以外的場景，而壞皇帝的 36 則故事裡，就有 13 張插圖是宮外的場景，從比例上可以看出壞皇帝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場景是在宮廷以外。雖然單元結構的方式仍然被運用在圖繪這些無道昏君，但是這些暴君的惡行顯然更有變化，也更具挑戰性。特別像是〈脯林酒池〉（圖 13；2-2）這類的故事，更需要畫家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來表現，大概也因為如此，昏君暴主的故事似乎更吸引人。這則無道夏桀的故事如下：

夏史，紀桀伐有施氏，得妹喜。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瑤台象廊。殫百姓之財，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⁸²

畫家在這張插圖中，做了相當仔細的描繪，相對應的文字提及的圖像幾乎都被畫了出來：夏桀跟他的寵妃妹喜似乎端坐於正殿之上，但是殿中沒有大臣只有眾多的宮女，清楚標示出作為暴君的桀只顧享樂。桀似乎正在跟妹喜說話，同時舉起右手指向殿外，順著他手指的方向，可看到中景人工構築出來的酒糟堆成的酒池，許多侍從還不停的將酒倒入上游的池中，酒沿著小渠道流入下方的大池，池中有船，除了撐船者，船上的人都跪著正在飲酒，大酒池邊也都圍滿了俯身低首飲酒的人，據文本得知有三千人都在鼓聲的鼓舞下牛飲。右邊則是滿掛著數不清的肉塊的棚架，形成所謂的脯林，許多人在林下大口的啃食著這些肉，或是兩兩分食著大片的肉塊，工人在一旁忙著運上更多的肉脯。酒池的前方，已經有人不勝酒力需要小童攙扶，還有醉臥在地，就直接睡倒的，一片狼籍，畫家費盡許多心思刻畫出了傳說中的「酒池肉林」。文本裡只提到有這些荒唐浪費的設施，但是並未提供進一步的細節描寫，畫家卻要將這些文字化為圖像，確實不易，而這張圖也的確充滿了有趣的細節，相較於前面的模範帝王總是端坐於朝堂之上，這些昏君的生活真是有趣許多，也可見到晚明畫家對於遠古頹廢帝王生活的豐富想像。

81 有關〈諫鼓謗木〉與〈揭器求言〉圖版，參見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 2，頁 35-36。

82（明）張居正，〈脯林酒池〉，《帝鑑圖說》，頁 824。

描寫暴君的生活不只需要想像力，似乎還需要更高的技巧。以秦始皇（224-210 B.C. 在位）的故事〈大營宮室〉為例：

秦史。紀始皇以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計宮三百，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⁸³

在這張〈大營宮室〉插圖（圖 14；2-9）裡，畫家為表現高大深闊廊道複雜的宮殿，顯然卯足全力，畫出了沿山而建的工整華麗又結構複雜的殿閣，同時，還讓始皇出現在中景的宮殿上俯視下方遊玩的宮中女眷，人物雖小，但是卻個個分明。更遠處還有宮殿在興建中，工人搭起鷹架在屋頂上鋪瓦，廣場上還有更多的工人運來材料。周遭雲水環繞，顯出宮殿所在位置的高聳。畫家如果沒有足夠的技巧，是很難畫出這樣複雜卻又清楚分明的界畫，連人物的活動都相當生動，充分展現出畫家的構稿能力，也考驗後來刻工的功力。

另外像是隋煬帝的〈遊幸江都〉（圖 15；2-27）、唐中宗的〈觀燈市里〉（圖 16；2-29），以及唐玄宗的〈斂財侈費〉（圖 17；2-31），畫家都把這些皇帝的荒唐行徑，表現得十分生動。若以〈遊幸江都〉為例，畫面上方佈置有皇后所乘坐的翔螭舟，下方則是煬帝所乘的豪華龍舟，兩者的結構都複雜而華麗，置放在一片江南水鄉之中，拉繹的繡夫、道路上又有夾舟而行的士兵，再加上迎接皇帝的儀仗隊伍，但是畫面仍處理得有條不紊，雖然無法將隋煬帝龐大的船隊都描繪出來，但是這些處理已經足以將文本所說的煬帝罪行表現無遺。〈觀燈市里〉一圖，畫面的遠處雲霧環繞下的九重宮闕，暗示著中宗與韋后私自微服出遊於於市井之上，也仔細的畫出大型豪華燈座，以及周遭慶祝節慶的百姓，以表現元宵夜裡市井的熱鬧。而在〈斂財侈費〉一景中，畫家使用較遠的視點，以便表現唐玄宗坐在宮殿上眺望臣下為其聚斂而來的漫天舟楫，船上載著四方的珍寶，玄宗則在樓閣之上大宴佞臣，這些細節都一一被圖繪起來。相較於明君的所為，要圖繪這些昏君的行徑，顯然更具挑戰性，但也能展現功力。也難怪後來當《帝鑑圖說》被傳入日本，這些昏君的故事，反而被圖繪得更加生動有趣，甚至變成了異國的帝王享樂圖繪，逐漸失去原來的鑑戒意圖。⁸⁴

83（明）張居正，〈大營宮室〉，《帝鑑圖說》，頁 832。

84 小林宏光的研究顯示了有趣的現象，日本畫家將這些昏君的荒唐行徑，賦予一種異國的浪漫情調，而將這些原本作為鑑戒用的故事，描繪成值得羨慕的異國帝王的浪漫故事。詳見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頁 11-31。

五、圖繪的作用

(一) 善可為法

《帝鑑圖說》書中每個故事前面的插圖，不僅是為了吸引小皇帝的注意，或幫助理解文意。觀覽這些圖繪，也能加強傳遞張居正想要傳達的意涵，透過圖繪來加強他要讓萬曆理解的為君之道。譬如書中所描繪的君主，總是有著謙卑的姿態。前述的〈君臣魚水〉即為一例，相較其他類似題材的繪畫，《帝鑑圖說》裡的劉備就是更加強調出求賢若渴的恭敬。再把《帝鑑圖說》裡的〈葺檻旌直〉（圖 10；1-28），跟現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宋畫家所畫的〈折檻圖〉（圖 18）加以比較，就可看出當中的差異。這兩張畫描寫的是同樣一則故事，但是插圖中的漢成帝（33-7 B.C. 在位），雖然在盛怒中，仍然十分克制的端坐於朝堂之上，顯出帝王當有的謙卑與尊嚴，但是〈折檻圖〉裡的漢成帝卻是右腳盤起，左手按壓在腿，面帶怒容的看著忤逆他的臣子，顯得相當不滿。如果再把其他帝王的形象也一併置入比較，就會發現，多數時候為了表現帝王的威嚴，像〈折檻圖〉裡的漢成帝的姿態是更常見的。譬如在更早前出版同樣作為幼童啟蒙用書的《日記故事》裡，正在跟臣下議論政事的唐太宗（圖 19）也是一腿盤起，坐姿就跟〈折檻圖〉裡的漢成帝頗為相似。⁸⁵ 更不用說，作為暴君之極致的秦始皇，在《秦併六國平話》中，也被圖繪成類似的盤腿姿態（圖 20）。⁸⁶ 相對於上述的姿態，在《帝鑑圖說》裡的君主，即便在生氣時，都是謙卑莊重的模樣，很少強調屬於帝王威嚴的部分。張居正顯然希望萬曆能學習帝王的仁義與謙卑，而非展現帝王的威勢，因而透過仔細的篩選適當的帝王姿態，運用圖繪來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二) 無法言說即以圖現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圖繪甚至隱藏有，在詭譎多變的政壇中，不能太過直接明白透過文字傳達的意涵。書中第 66 則聖君的故事在描繪宋太祖〈敬受母教〉（1-66），⁸⁷ 清楚地傳遞身為國君之母的皇太后的憂慮，他擔心宋太祖是否真能勝任治國的重擔，而宋太祖則回應其母以夙夜匪懈的努力，果然成為聖君且因此

85 此處所用來比較的《日記故事》成書於 1542，是民間印製來作為幼兒的啟蒙用書。此圖詳見《日記故事》，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43。

86 類似的圖像，詳見《秦併六國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冊 33，頁 18-19、62-63、102-103。

87 〈敬受母教〉圖版，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頁》<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520483t/f75.ite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5 日）。

而致大孝。可以想見自幼即十分崇敬生母李太后的萬曆皇帝在讀到此則故事時，將更加兢兢業業的面對治國的重任。但是另外一則圖像的運用，更可見出張居正如何巧妙的穩定他的權力來源。在前面已經提及的〈燭送詞臣〉故事的插圖（圖 21；1-81），描繪了蘇軾重回宮廷後某夜被宣仁高皇后與哲宗召見的場景。其實表現這則故事時，重點往往是在顯示多才多藝但卻政途多舛的蘇軾於此刻重返宮廷，再度受到重用的榮耀時刻。現存仍有不少圖畫是特別描繪蘇軾被侍從簇擁，以皇帝特賜的御前金蓮燭送他回翰林院當值的景象。⁸⁸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帝鑑圖說》〈燭送詞臣〉故事的插圖，卻發現圖像裡的重點被巧妙地移轉：只見半側著身子的蘇軾跪著聽旨，而哲宗與其祖母宣仁高皇后則端坐朝堂，特別是太皇太后以正面姿態端坐於上，而哲宗則微側坐於其下，而且這種正面端坐的姿態就跟明代的皇帝肖像類同（圖 22），⁸⁹ 因而清楚標示出太皇太后為畫面上的焦點。以這樣顯著的方式去圖繪宣仁高皇后的重要性，張居正明白地傳達出他對這位傑出女子的崇敬；但是另一方面，考察當時的狀況，年幼的萬曆，也正需要李太后的輔佐，明眼人也許能看到這兩者間的類同，知道張居正以古喻今，藉由圖像來標舉在同樣也是輔佐幼主的李太后，⁹⁰ 以便更加鞏固張居正的權力來源。

其實如果進一步詳查，張居正確實與李太后有著密切的互動，首先是李太后對於張居正非常的支持，⁹¹ 而張居正也常常為李太后書寫相關的題記詩詞或是文章。⁹² 而且在萬曆一五七八年完婚之後，李太后擔憂無法直接控制萬曆在後宮的日常生活起居，希望皇后以及接下來要進入後宮的這些女子，能瞭解婦道的重要性，李太后還讓張居正將東漢時期班昭（49-ca.120）所撰的《女誡》加以註解，

88 類似相關的圖像，可在許多地方見到，詳見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封面插圖以及圖版 12、13、14、34，頁 41-76。

89 有關明代帝王肖像的演變與相關的圖版，詳見 Wen Fong, Watt, James C. Y. ed.,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Distributed by H.N. Abrams, 1996), plate 162.

90 李太后應該也能見到《帝鑑圖說》這本書。特別是在萬曆大婚之前，李太后掌管萬曆後宮的生活起居，他們也住在同一般宮中。從李太后對萬曆教育的注重，萬曆應當也會跟太后談起《帝鑑圖說》裡的故事。李太后其實管教萬曆相當嚴厲，有關李太后對待萬曆的方式，詳見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 459-460。李太后的傳記，詳見（清）張廷玉編纂，《明史》，卷 114，〈列傳二·孝定李太后傳〉，頁 3534-6。

91 有關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支持，詳見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頁 458-466。

92 張居正也為李太后在許多的場合做了不少的文章與詩詞，詳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3，頁 70-72、179-181、199-200、208-209、218-219、240-241 以及冊 4，頁 9、177、202。

做成了《女誠直解》一書。⁹³ 也就是說張居正對於李太后的要求，都能盡力的配合，而上述藉由圖像來間接褒獎李太后的作為，應該也是他處心積慮下的產物，而這些作為對於張居正能夠取得皇權的信任，當然是非常關鍵。

（三）視覺化的政治劇本

這些圖像最重要功能還在喚起萬曆對於聖王善行的模仿，對昏君惡行的鑑戒。將古代聖王故實形象化，不僅是要讓萬曆容易理解或加深印象，更可作為萬曆執行帝王職責時的參照。雖說《帝鑑圖說》裡的故事都是之前歷代帝王的事蹟，但是插圖並未針對不同朝代特別去刻畫出不同的宮殿車馬服制。這樣一來，也許讓萬曆覺得這些範舉並不是遙遠過去的故事，而是可以被模仿實行的行為。加上圖畫的製作精美（根據版畫的效果來判斷），這些描寫帝王舉行各種儀式的圖繪，應該會讓萬曆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就在萬曆二年（1574），宮中宣告要宴賞在外的廉能官員，《明神宗實錄》中的記載如下：

大學士張居正言。太祖時每遇外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以特差行人齎勅獎勵，或封內醪金幣以賚之。……⁹⁴

進一步對照看原來《萬曆起居注》中更詳細的記載，就知道召賞外官是在講述完《帝鑑圖說》書中的類似事例之後，⁹⁵ 且很可能是由張居正所主導。事實上，《萬曆起居注》的詳細紀錄便是錄自他的疏文，當中清楚說明了此事的原委：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於文華殿面奏。伏蒙皇上親發玉音：「將各官引來，朕面加獎諭。欽此。」…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如臣等前所進《帝鑑圖說》中，〈褒獎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為美譚。我太祖高皇

93（明）張居正，《女誠直解》，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4，頁393-408。

94《明神宗實錄》中亦載有此事，但並未提及《帝鑑圖說》在此所產生的影響，詳見《明神宗實錄》，卷21，〈萬曆二年元月戊子〉，頁2b-3a（560-1）。

95 賈乃謙已經注意到講述這些故事與實際執行政務當中的關聯，詳見賈乃謙，〈前言〉，《帝鑑圖說評注》，頁6。賈乃謙依據的是《萬曆起居注》中的記載，詳見《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冊1，影印明抄本，頁143-145）。另見《萬曆起居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冊1，影印明抄本，頁153-156）。

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⁹⁶

所謂的「〈褒獎守令〉（圖 23；1:26）、〈召試縣令〉（1:55）諸事」分別指的是《帝鑑圖說》裡的漢宣帝（73-49 B.C. 在位）以及唐玄宗（712-756 在位）的故事。⁹⁷前者說的漢宣帝選用官員，特別重視知府知縣的地方官，因為與百姓的福祉最有關連，後者則是唐玄宗將吏部新選的縣令都召到殿前，親自出題考試，問其治民之策。兩者都顯示了皇帝對於地方官的重視。顯然，張居正方才講完這些故事不久，就用心良苦的替萬曆籌劃，讓他有機會可以模仿這些有名賢主的行徑，或許在萬曆畢恭畢敬地主持這些儀典時，腦中也會浮現《帝鑑圖說》裡這些相關的圖繪。

在張居正的詩文中，也屢屢使用《帝鑑圖說》裡的典故，譬如在他的這首〈隆禮師臣〉詩中說道：「風雲一代真奇會，魚水千年豈易投？淺薄無能稱獻納，祇將丹悃答皇庥」，⁹⁸張居正使用了上述「君臣魚水」（1:35）的典故，⁹⁹來說明他與萬曆君臣間的親近與對彼此的信賴，盛讚皇帝對其禮遇與重用，同時為表達感激之情，更希望能繼續效忠以報盛情。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讚美萬曆學習了《帝鑑圖說》裡的聖王舉止：

齋居端默自沈沈，精意俄然格帝心，萬里春隨溫詔下，崇朝澤并聖恩深。

皇穹響答同桴鼓，農扈歡歌勝雨金，自是聖朝無闕事，不需露禱向桑林。¹⁰⁰

這首詩讚美萬曆為百姓求雨奏效的事件。查閱史冊，萬曆二年五月五日，因久旱不雨，且順天府官員求雨無效，張居正等官員敦請萬曆求雨，萬曆親自於宮中齋戒祈禱後，過三日果然雨至的事件。¹⁰¹在這首詩中，張居正的「齋居端默自沈沈」引用了《帝鑑圖說》裡的〈夢賚良弼〉（1:10）的典故，¹⁰²以商高宗「恭默思道」的

96 我在翻閱了《張居正文集》後，找到《萬曆起居注》記載此事的文獻來源，也就是張居正最先所上的疏文，見（明）張居正，〈請定面講廉能儀注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142-3。除了讚揚萬曆能夠取法明太祖等前代令主的作法之外，為了怕這些很久未得皇帝召見的外地官員不諳禮儀，張居正在這個疏文，很重要的建議便是讓這些官員能夠先演習儀節，以免屆時倉皇失措。

97 〈召試縣令〉圖版，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頁》<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520483t/f51.ite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5 日）。

98（明）張居正，〈隆禮師臣〉，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4，頁 181。

99（明）張居正，〈君臣魚水〉，《帝鑑圖說》，頁 757-8。

100（明）張居正，〈澍霖應禱〉，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4，頁 185。

101《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冊 1，頁 167-8）。

102（明）張居正，〈夢賚良弼〉，《帝鑑圖說》，頁 724。

至誠來比喻萬曆為了祈雨齋戒的誠意，終於感動了上天，因此在萬曆正式祈雨之後，不久果然天降甘霖。且更進一步的，張居正又使用了「不需露禱向桑林」來讚美萬曆，指的是因為萬曆沒有做下不對的事，所以萬曆在宮中靜默齋戒就可以求得甘霖，無須像《帝鑑圖說》裡的〈桑林禱雨〉(1:8)中的商湯王一樣，要身披白茅草，將自己作為祭典中的犧牲一般，且須細訴自身所犯過錯，自責悔過，禱雨於桑林之中，才因此求得雨下。¹⁰³在這點上，萬曆甚至還勝過商湯王。

其實就在萬曆二年萬曆召見外官獎賞他們在地方上的辛勞後，張居正就特別寫了詩文讚賞萬曆的舉止：

紛紛計吏集金門，勞遣親煩萬乘尊，共望龍顏瞻日表，近承天語挹春溫。
虞詢方岳遺風遠，漢獎循良古道存，知己尚然酬一諾，諸臣何以報殊恩？¹⁰⁴

詩中除了再度提及漢宣帝〈褒獎守令〉的典故之外，張居正又引用了另一則典故，所謂的「虞詢方岳遺風遠」，就是指《帝鑑圖說》裡的〈任賢圖治〉(1:1)故事，堯命人「又訪四岳舉舜登庸」，¹⁰⁵說的是想要國家大治的堯，任命了許多的賢者來幫他治國，而又訪問四岳的官員，詢問有何賢人可以薦舉，於是天下的才俊都被網羅到朝廷之上，讓堯得以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

透過這些事件與詩文的對照勘查，可以看到張居正非常聰明的，一再利用《帝鑑圖說》裡的故事作為勉勵萬曆模仿聖君的範本，他往往先進講故事，接著讓萬曆直接學習故事中的聖王之舉，等到儀式或是事件過後，再度寫詩讚美萬曆，以便加強萬曆對於這些聖君先王的崇敬，且讓萬曆能夠覺得自己也是這個聖王傳統中的一部分。實在不難想像，當萬曆在執行這些職責時，腦海中所浮現的圖像，或許正是將自己置於《帝鑑圖說》裡的樣貌。

而且張居正一開始進呈《帝鑑圖說》時，就上疏跟萬曆提醒過這本書的用途：「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他甚且給萬曆一種願景，如果他真能學善戒惡，成為令主，那麼「而于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¹⁰⁶ 或

103 (明)張居正，〈桑林禱雨〉，《帝鑑圖說》，頁 721。

104 (明)張居正，〈面獎廉能〉，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4，頁 182。

105 (明)張居正，〈任賢圖治〉，《帝鑑圖說》，頁 713。

106 (明)張居正，〈進帝鑑圖說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104。

許在當時年幼的萬曆心中，真的希望自己有天也可以成為書中讀到的、圖上所描繪出來的，令人崇敬的古聖先王。就這樣，張居正透過《帝鑑圖說》的講述，以及鼓勵萬曆的親身效仿，使得《帝鑑圖說》成為了一套視覺化了的政治劇本，而這套劇本，確實提供了許多問題的應變與解決方式。也難怪沈德符要說：「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為法，自沖年即有小世宗之號，然亦繇《帝鑑》一書，啟沃聖心……。」¹⁰⁷

六、聖王再塑之破滅

張居正與萬曆兩人對於《帝鑑圖說》的討論，被多次記載於《起居注》與《實錄》中，一直到萬曆四年都還有這本書被進講的紀錄。¹⁰⁸ 賈乃謙也提到，透過《帝鑑圖說》故事的進講，形成一種君臣論政的方式，對於當時要施行新政可說有相當的助益。¹⁰⁹ 而且翻諸史冊，萬曆在位的前十年，的確沒有那一本書的講讀被如此頻繁地紀錄著。

這部書，的確是張居正想要將萬曆培育成聖王賢君的計畫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書中的故事往往作為張居正想要有所闡發的起點，譬如前面提到講完漢宣帝的〈褒獎守令〉故事後，他將其衍申至明代其他皇帝的作為：

我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齎敕獎勵，或封內醪金幣以賚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舉宴賞之典。故兩百餘年，重熙累洽，興致太平，實由於此。……仰窺聖心，蓋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聖祖綜核吏治之軌也。¹¹⁰

如此一來，古聖先賢的聖明作為更顯得不是這般的遙不可及，甚至是早被傳承於明代君王治國傳統中。藉此，張居正甚至宣稱他的改革，不過是復原舊制。這與他早年任職翰林院編修，曾潛心研究先前的明代政治體制以及明代帝王作為甚有關連，

107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頁 800-1)，補遺，卷 1，今上史學條。

108 關於講讀在史冊中的紀錄，詳見附錄五。

109 有關這些討論，詳見賈乃謙，〈前言〉，《帝鑑圖說評注》，頁 5-7。牛建強、汪維真，〈從《帝鑑圖說》看十六世紀末的中國帝政〉，頁 32-33。

110 詳見(明)張居正，〈請定面講廉能儀注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142-3。

他就曾說道：「余在史局，好具問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言及孝廟時，輒悲咽」。¹¹¹可見除了閱讀宮中的檔案，他也會詢及故老。有時他的創新之舉，他也會說是古已有之。萬曆二年（1574），他上疏給萬曆說明進獻御屏一座的用意：

竊以為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主尊居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御座屏風，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於奉天門西序……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為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為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升、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¹¹²

張居正所進獻給萬曆的看起來像是折疊式的屏風，根據上文的形容長達十五扇，中間繪地圖，左右是文武官員的職名。御屏就置於文華殿後，張居正進講的時候，便可與萬曆討論官員的升遷，且天下官員的名冊也可一覽無遺，可謂十分方便。這是張居正為了讓萬曆能夠更清楚掌握百官狀況所設，但是他卻仍然要將此舉遠追唐太宗的作為，以便突顯自己是有所本。劉若愚在他的《酌中志》也追憶當時有此一屏風：

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殿也。……殿內圍屏，中數扇畫輿地圖，左數扇貼文官職名，右數扇貼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此係萬曆初年輔臣張文忠公居正所創造者。至二十四年後，神廟御居啟祥宮，復另置一小圍屏，高二尺餘，中左右亦如之，於啟祥宮前殿安設。¹¹³

111（明）張居正，〈遼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銘〉，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343，類似說法亦見（明）張居正〈王承奉傳〉，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577。

112（明）張居正，〈進職官書屏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160-1。

113（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150），卷17。

而且即便日後萬曆不再時時講讀，也不常常造訪文華殿後，他仍然另造一座較小的類似的屏風，以便在他的寢宮觀覽。張居正雖於死後遭到清算，但是他所創設或教導的內容其實並未被全然摒棄。

雖然張居正常常會標舉古代的聖王賢舉，但是他其實更重視近代帝王的舉措。有時甚至會宣稱三代的律法與機構的設置，也不見得勝過明代：「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昭代者也」。¹¹⁴ 畢竟遠古時代的制度，早已無法適用於當代。他其實看不起那些口稱三代，但是不知道與時俱進的腐儒，特別是對於宋儒，張居正向來沒有什麼好評。¹¹⁵ 因此，萬曆四年（1576）五月，大約在《帝鑑圖說》講讀完畢之後，張居正就又上疏道：

茲臣等恭查閣中所藏皇祖親筆聖諭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聖旨并票帖共七十道，又於纂修館中，揀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親批奏、題本，共六十五本，進上睿覽。恭惟我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伏望皇上萬幾之暇，特加省閱，則致理之方，不外於法祖而得之矣。¹¹⁶

張居正特別又哀集了明太祖與世宗的親筆批奏，以便讓萬曆能夠加以學習如何處理政務，相對於《帝鑑圖說》裡所提倡的原則原理，這些章奏更能見出實際政務的治理，張居正確實用心良苦。¹¹⁷ 而且張居正也特別標舉出嘉靖皇帝在前二十年的政績，認為有前代其他帝王所不及之處，因此要萬曆加以研讀。到了萬曆八年（1580），張居正更加擴大這些要萬曆研讀的文獻，把明代前朝皇帝的《寶訓》、《實錄》逐一檢閱，加以分類，共有四十款，在常態的晨講之後進講，希望藉此萬曆能習得政事。¹¹⁸

顯然遙遠的過去，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境界與為君的道德高度，但是真正處理政務時，張居正認為還是要借助前面明代皇帝的例子來學習。因此，《帝鑑圖說》的研讀可說是張居正為萬曆設計的教育計畫的前半部，後半就是以實際的政務處理的

114（明）張居正，〈辛未會試程策〉，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147-150。

115（明）張居正，〈雜著（十三、十四）〉，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3，頁656、658-9。張居正對於宋儒似乎都無好評，其他評論參見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2，頁138、224、912。

116（明）張居正，〈進世宗御筆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212。

117 沈德符也評論了張居正的作法，認為是相當值得讚揚的舉措。詳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冊上，頁227），卷9，〈閣臣進御筆〉。

118（明）張居正，〈請教陳謨烈以禪聖學疏〉，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1，頁437-8。

學習為主。然而，現在來看，前半的成效似乎要多過後半。

張居正對於萬曆的影響頗大，但是在萬曆前十年的後半段，萬曆對於張居正也似乎逐漸有所不滿。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死後不久，對於張的驕橫等等的批評接踵而至。萬曆也才發現這位他十分敬畏，時時警惕著他不可驕奢，要節用愛民的老師，過著何等奢華的生活。¹¹⁹ 萬曆的失望似乎並沒有全然隨著剝奪所有張居正的官銜、抄家、流放甚至逼死他的兒子而止息。萬曆十六年（1588），在張居正已經死後六年，萬曆開始跟他的臣下辯論有關唐太宗與魏徵君臣的功過，雖然他的臣下都覺得太宗君臣的作為應該是瑕不掩瑜，萬曆隨後仍然宣布要停講《貞觀政要》。¹²⁰

沈德符也記載了此事：

今上聖學高遠，遠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啟講筵，上御文華。講畢，復傳諭閣臣申時行等，曰：「唐魏徵為何如人？」對以「徵能強諫，亦是賢臣」。上駁云：「徵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後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賢者。」……又傳聖諭云：「唐太宗脅父弑兄，家法不正。」閣臣對曰：「倫理果虧，閭門亦多慙德，但納諫一事可取耳。」此語稍為得之。上意終不釋，命罷《貞觀政要》，而講《禮記》。¹²¹

對於太宗魏徵君臣的不滿，或許仍可歸結自對於張居正的失望。畢竟，兩人在情誼深濃時，萬曆的確是以魏徵來標舉張居正。太宗與魏徵也是在《帝鑑圖說》裡故事收錄最多的一對君臣，被收錄的十三則太宗故事裡，有五則是太宗與魏徵君臣間的互動。充分顯示出張居正對於兩人的崇敬，甚且以此自勉或與萬曆互勉。這些在張居生前被視為佳話，一再講讀的材料，在萬曆掌權之後，或基於對張居正仍難以釋懷，萬曆開始進行對太宗君臣的重新評價。可說，即便「世間已無張居正」，¹²² 萬曆仍然深受影響，非要進行一些對抗不可。

後來，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又有一本新的由金濂（fl. ca. early 17th c.）所

119 有關萬曆的失望，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二章，頁 53-92；韋慶遠，《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韋慶遠於書中詳細描寫早先萬曆與張居正君臣間的和諧關係（頁 476-483）、張居正的苦心教導（頁 483-497），以及最後君臣關係的轉變（頁 830-840），相當值得參考。

120 有關這些辯論詳見《明神宗實錄》，卷 195，〈萬曆十六年二月乙丑〉，頁 3a-5b（3663-3668）。又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冊上，卷 2，〈貞觀政要〉，頁 63-4。

121（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貞觀政要〉，頁 63-4。

122 黃仁宇書中的章節標題，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三章。

編纂的《帝鑑圖說》出版，¹²³ 李維楨在他的序言中感嘆說自從張居正死後，便很少舉行經筵，上下亦不交通，李維楨甚至批評萬曆好皇帝的部分學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壞皇帝的部分則是學了不少：

是以辛壬而前，主無失德，國無秕政。斧藻琢磨，此圖未為無助。相臣以駮乘芒刺種禍，而繼之者禮貌事權不能與江陵伍。癸甲而後，朝講稀御，官府睽隔。圖說之善者行不十一，而不善者往往郵而效之。比年與亂同道，橫政日出。¹²⁴

沈德符的記載也類似：

然《貞觀政要》，亦上初御講幄，輔臣即以勸講，至是乃厭薄中輟。或以張居正所進，終未審當聖意耶？然自《政要》罷後，次年四月遂不復御文華。廣廈細旃，迄成塵坌，輔臣屢請不允。其年冬，即有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之疏。庚寅元旦召對以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唐太宗貞觀之治，季年亦少遜焉。蓋古今同一慨矣。¹²⁵

萬曆罷講《貞觀政要》之後，隔年四月就不再舉行經筵，萬曆庚寅（1590）之後就幾乎不再上朝，連閣臣要見萬曆也難。沈德符不禁感慨朝政維持的困難，認為先盛後衰恐怕是古今一同。張居正所開始的教育聖王的志業，在他死後便無以為繼。在張居正死後，萬曆原先以為他終於大權在握，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卻在許多決定上，遭遇到文官集團的反對。最終，他以怠忽職守的方式來與文官集團對抗。逐漸以一種「不作為」的罷工方式，來對抗他的臣子。¹²⁶

上述《帝鑑圖說》的分析顯示了張居正驚人的先見之明，他早就料到政壇的險惡，而試圖在掌政的初期，透過一本繪圖的教科書，既能引起萬曆的興趣，又能達到教育萬曆的目的。藉由仔細分析《帝鑑圖說》的內容構成，突顯出張居正在文本

123 這個新的版本是重新刊刻者，配圖也都重新製作。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不完整），上海圖書館也有一本。相關圖版見周燕，《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圖版 166。Julia Murray 也在他的研究中提及此版本，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77-82.

124 (明)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0，卷 8，〈帝鑑圖說序〉，頁 5b-7a (460-1)。另外在 Julia Murray 的文章中也提及此序，詳見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70, 71, 81.

125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貞觀政要〉，頁 63-4。

126 黃仁宇有相當深入的描寫，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三章。

選擇的重點，並且分析出圖繪裡所隱含的重要政治訊息，看出張居正如何巧妙的鞏固自己政治權利的來源，且為自身可能招致的禍端，早做預防，以便防患於未然。藉著圖文的安排與教導，他縝密的為自己鋪設了萬曆前十年中興之治的基礎。同時，透過此書的分析，更可見到所謂的規諫圖繪如何被製作、使用，受諫者如何自這些圖文的安排中學習到聖賢之道；往後，萬曆又是如何的回應他所受過的教誨。觀者或是受教者對於規諫圖繪的回應，是以往討論此類圖繪時，較難論述的部分，這個研究卻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規諫運作的方式，與其受教者的接受與回應。《帝鑑圖說》代表的是張居正改革大業的起始點，也是他教育聖王的藍圖。透過對於過往帝王作為的再詮釋，透過栩栩如生的圖繪的安排，即使，在他死後，他所企望的中興大業逐漸崩解，《帝鑑圖說》卻成了這個企圖心的最後一絲痕跡。而書上精美的插圖，與精細的刻工也見證了在萬曆初年的敘事畫作與版畫的成就。

[後記] 本文之完成要感謝國科會的計畫經費支持：〈帝鑑圖說版畫之構成與東傳——近世中日對規鑑圖繪之詮釋與變易〉(NSC-90-2411-H-007-038-)，特此申謝。另外在找尋資料的過程，也特別感謝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等單位的協助。部分研究成果的首次發表是在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a’s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niversität Würzburg, Würzburg, 27-29 May 2004)，同時也有英文文章發表於論文集(Lin, Li-chiang,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321-359.)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之基礎，再加上新的調查與論述所完成。另外，還要特別感謝本文的匿名審查人，因其詳細的閱讀與精闢的建議，幫助本文更臻完善。當然，文中疏漏處概由本人負責。

附錄一 萬曆之前明代帝王主導下所製作的訓鑑類書籍¹²⁷

帝王	書名與內容	
洪武 ¹²⁸ (1368-1398 在位)	昭鑑錄 (洪武初年所編)	收集藩王的善惡事蹟編纂成書，這本書也可能是明代第一本將皇族事蹟，以善惡兩部分來編輯的書，全書即分為「善為可法」和「惡為可戒」兩部分。
	永鑑錄 (1373)	收錄古代事蹟分為六章，以淺近的語言講述的故事。前兩章是用來訓誡臣下，藩國後四章則用來鑑戒，也分為「善為可法」和「惡為可戒」兩部分。
	歷代駙馬錄	以淺近語言講述的歷代附馬的善惡事蹟
	公子書	收集古代有關的善惡事蹟，分為三章，用來鑑戒開國功臣的子弟。 ¹²⁹
永樂 ¹³⁰ (1403-1424 在位)	文華寶鑒 (1404)	用來教育太子的書
	聖學心法 (1409)	用來教育太子的書
宣德 ¹³¹ (1426-1434 在位)	帝訓 (1428)	用來教育太子與帝王的書
	臣鑑 (1426)	收集自春秋到元代的大臣事蹟，也分為善惡兩部分。
	外戚事鑑 (1426)	收羅有關歷代外戚的善惡事蹟的書，用以鑑戒外戚。
景泰 ¹³² (1450-1456 在位)	〔御製〕歷代君鑑 (1453)	收羅前朝的君主事蹟，甚至也包含明代初年的君主事蹟，也使用「善為可法」和「惡為可戒」來編輯全書。
成化 ¹³³ (1465-1487 在位)	文華大訓 (1482)	為太子所編之書，嘉靖時曾重刊並為寫序以賜太子。

127 此表資料主要取自(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131，頁96、95以及《明實錄》。此表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明代帝王所製作的規諫書籍的總表，此表涵蓋的主要是與《帝鑑圖說》的編排較為接近的皇家出版的規諫書籍。同時，有些書籍的名稱已被四庫群臣所節縮，譬如說《御製歷代臣鑑》，就被簡稱為《臣鑑》，此書現在被重新影印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120。

128 有關明太祖的這四本書的記錄，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131，子部41，頁11a-12a(793-4)。

129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131，子部41，頁12a(794)。

130 永樂製作的這兩本書也可見於賈乃謙的文章中，見賈乃謙，〈前言〉，《帝鑑圖說評註》，頁9-10。有關《文華寶鑒》的記載，見載於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日，詳見《明太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10，卷30，頁7a-b(545-6)。《聖學心法》之記載，見於《明太宗實錄》，卷88，永樂七年二月甲戌日，頁1a-b(1161-2)以及(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95，子部5，頁30b-32a(87-8)。

131 《帝訓》的相關記錄，見《明宣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18，卷38，〈宣德三年二月〉，頁1a-14b(927-954)。《臣鑑》與《外戚事鑑》之記錄，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131，子部41，頁10a-b(793)。

132 根據四庫諸臣的評論，《〔御製〕歷代君鑑》跟宣德時的《臣鑑》頗為類同，見(明)朱祁鈺，《歷代君鑑》，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3，卷131，子部41，頁10b-11a(793)。不過《〔御製〕歷代君鑑》卷29-35包含了明代早期的幾位皇帝，此種編輯的作法也可見於范祖禹(1041-1098)所編的《帝學》。(宋)范祖禹，《帝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121，頁1-292。

133 《文華大訓》的記錄，見《明憲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48，卷235，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日，頁1b-5b(3992-4000)；也可見於《明孝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51，卷1，頁2，以及弘治三年二月戊申日的記載，見《明孝宗實錄》，卷35，頁6b-9a(764-9)。《文華大訓》後來在嘉靖時期重印，嘉靖亦為之做序，詳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6，冊3，卷96，頁3b-34a(109-110)。

附錄二 《帝鑑圖說》與《歷代君鑑》相同故事的文本比較

《帝鑑圖說》	〔御製〕《歷代君鑑》
<p>(no.1) 〈任賢圖治〉：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羲叔居南交，理南訛；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朔易。又訪四岳，舉舜登庸。</p>	<p>〈帝堯陶唐氏〉：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卷2，頁3)</p>
<p>(no.2) 〈諫鼓謗木〉唐史，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毀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p>	<p>〈帝堯陶唐氏〉：堯勤於君道，作布政之宮曰衢室。立毀謗之木，使天下得盡其言；建進善之旌，使天下得盡其才；置諫鼓於朝，使天下得攻其過，天下之人無有異心。(卷2，頁4)</p>
<p>(no.3) 〈孝德升聞〉虞史，紀舜父瞽叟，娶後妻，生象。父頑，母嚚，象傲，常欲殺舜。舜避逃，克諧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賢德可以遜位，群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p>	<p>〈帝堯陶唐氏〉：堯以子丹朱不肖，求賢德可以遜位者，群臣咸舉舜，舜為人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卷2，頁4)</p>
<p>(no.4) 〈揭器求言〉夏史，紀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p>	<p>〈禹〉：禹既即位，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冀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卷3，頁1)</p>
<p>(no.5) 〈下車泣罪〉夏史，紀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p>	<p>〈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卷3，頁112)</p>

附錄三 《帝鑑圖說》的版本

《帝鑑圖說》版本頗為複雜，目前仍有不少版本被收藏於中日等地的公私立圖書館。目前關於版本的討論以賈乃謙最為詳盡，參見賈乃謙，《帝鑑圖說評注》，〈前言〉，頁 7-11。目前所知收藏最多不同版本的可能是日本宮內廳圖書館的收藏。本表只是初步的表列，版本的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礙於研究所限，此處並未列出日本所翻刻的版本。

版本	製作時間	尺寸（半頁圖框）
張居正進呈手抄繪圖原本	隆慶六年	？
張居正刻本	萬曆元年	？
潘允端本	萬曆元年	h.40/w.41.5cm
金陵書坊胡賢刊本	萬曆元年	20.8x14.1cm
其他的明刻本	萬曆元年	
雲南監察御史郭庭梧刊本	萬曆三年	20.3x14.2cm
金濂刻本	萬曆三十二年	
天啟刻本	天啟二年	
法國國家圖書館本彩繪本	十七世紀上半？	
清純宗堂刊本	嘉慶二十四年	19.8x14.2cm

附錄四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所藏潘允端本之內容

第一冊		
內容	頁碼	說明
帝鑑圖說敘	1a-2a	陸樹聲撰
聖哲芳規(引首)	1a-2b	每頁一大字
39 則模範帝王故事	1a-39b	原有 81 則模範帝王，現只剩 39 則
帝鑑圖說頌并序	1a-2a	潘恩撰

第二冊		
內容	頁碼	說明
狂愚覆轍(引首)	1a-2b	每頁一大字
36 則暴君故事	1a-36b	
帝鑑圖說述語	37a	張居正撰， ¹³⁴ 簡要說明所收故事及其用意的短文
帝鑑圖說後序	1a-1b	王希烈撰
帝鑑圖說序	2a-2b	王宗沐撰

134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述語〉，收入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 1，頁 107-114。如果潘允端本的第一冊完整的話，應該也會收有關於收錄模範帝王的簡要說明，但是三十九則後的書頁已佚失，因此未見前半部的述語。《張居正集》所錄的述語，即是將分別位於《帝鑑圖說》原本故事最後的兩處說明集合而成。現存的郭庭梧刊本仍保有此二術語，詳見(明)張居正，《帝鑑圖說》，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14。

附錄五 《帝鑑圖說》的進講記錄

時間	進講之內容	出處
萬曆元年三月	屈尊勞將	《明神宗實錄》(冊 11, 頁 1b-2a)
萬曆元年秋	臨雍拜老	《張居正集》(冊 2, 頁 1145)
萬曆元年十月	不喜珠飾	《明神宗實錄》(冊 18, 頁 2b-3a) 《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15-117)
萬曆二年一月前	褒獎守令	《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53-156) 《張居正集》(冊 1, 頁 142-143)
萬曆二年一月前	召試縣令	《張居正集》(冊 1, 頁 142-143) 《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53-156)
萬曆三年三月	賞強項令	《明神宗實錄》(冊 36, 頁 1a-2b) 《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359-360)
萬曆四年三月	納箴賜帛	《張居正集》(冊 1, 頁 49) 《明神宗實錄》(冊 48, 頁 1b-3a)
萬曆四年三月	寵幸番將	《明神宗實錄》(冊 48, 頁 2a-3a)

附錄六 《帝鑑圖說》進講內容

時間	資料來源與講讀內容
屈尊勞將 萬曆元年三月	<p>(萬曆元年三月)甲申 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有折衝之勇？自今望 皇上留意武備，將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權柄，使得以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 上然之。</p> <p>《明神宗實錄》(冊 11, 頁 1b-2a)</p>
臨雍拜老 萬曆元年秋	<p>《張居正集》(冊 2, 頁 1145)</p>
不喜珠飾 萬曆元年十月	<p>(萬曆元年十月)乙卯 上御文華殿，輔臣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宋仁宗不喜珠飾事。 上曰：國之所寶，在於賢臣，珠玉之類，寶之何益？居正因言，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五穀養人，故聖王貴之，金玉雖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銖兩之間，為價不貲，徒費民財，不適於用。故書言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良以此耳。 上曰：然宮中婦女只好粧飾，朕於歲時賜賞，每每節省，宮人皆以為言，朕云：今庫中所積幾何？居正頓首曰： 皇上之言及此， 社稷生靈之福也。……</p> <p>《明神宗實錄》(冊 18, 頁 2b-3a)；《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15-117)</p>
褒獎守令 萬曆二年一月之前	<p>《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53-156)；《張居正集》(冊 1, 頁 142-143)</p>
召試縣令 萬曆二年一月之前	<p>《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153-156)；《張居正集》(冊 1, 頁 142-143)</p>
賞強項令 萬曆三年三月	<p>《明神宗實錄》(冊 36, 頁 1a-2b)；《萬曆起居注》(冊 1, 頁 359-360)</p>
納箴賜帛 萬曆四年三月	<p>《明神宗實錄》(冊 48, 頁 1b-3a)；《張居正集》(冊 1, 頁 49)</p>
寵幸番將 萬曆四年三月	<p>(萬曆四年三月)戊戌 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至唐玄宗于勤政樓設宴寵幸安祿山事。 上覽其圖，有勤政樓三字，曰：樓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樂宴飲何也？輔臣張四維對：此樓建于玄宗初年，是時方勵精圖治，故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于天寶志荒，所以致播遷之禍。居正因言：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有始治而終亂，由聖而入狂者。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即我 世宗皇帝嘉靖初年，于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欲以知王業艱難，又命儒臣講周書無逸篇，講畢，宴文武大臣于殿中。至其末年崇尚焚修， 聖駕不復臨御，殿中徒用以騰寫科書，表背玄像而已。昔時勤民務本氣象不復再見，而治平之業亦寢不如初。夫以 世宗之明，猶然有此，以是知克終之難也，而治平之業亦寢不如初。夫以 世宗之明，猶然有此，以是知克終之難也，昨講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亦是此義， 上嘉納之。</p> <p>《明神宗實錄》(冊 48 頁 2a-3a)</p>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戴德，《大戴禮記》，收入《四庫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范祖禹，《帝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冊 121。
- (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北京：北京圖書館，1998，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內府彩繪插圖本複製。
- (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臺北：世界書局，2009，據明代內府刊本複製。
- (明)朱祁鈺，《歷代君鑑》，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21。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50。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
- (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63。
-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萬曆元年，1573，潘允端刊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藏。
- (明)張居原著；陳生璽、賈乃謙整理，《帝鑑圖說評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3。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冊 14。
- 《三國志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冊 169，據日本東京公文書館之內閣文庫藏本影印。
- 《明孝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4，冊 51-52。
- 《明神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 81。
- 《明憲宗實錄》，收入黃彰健編，《明實錄》，冊 48。
- 《秦併六國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冊 33，據日本倉石武四郎影印本影印。
- 《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冊 1，影印明抄本。
- 《萬曆起居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冊 1，影印明抄本。

二、近代論著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石刻線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1989，冊 19。
-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冊 10。
- 牛建強、汪維真，〈從《帝鑑圖說》看十六世紀末的中國帝政〉，《史學月刊》，2000 年 4 期，頁 26-36。
- 石守謙，〈南宋的兩種規鑒畫〉，《藝術學》，1 期，1987 年 3 月，頁 7-39。
- 周蕪，《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林麗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歷史學報》，24 期，1996 年 6 月，頁 61-76。
-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 期，2012 年 9 月，頁 174-177。
- 韋慶遠，〈張居正與《歷代帝鑑圖說》〉，《歷史》，1997 年 8 期，頁 24-29。
-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冊 2。
- 張舜徽主編；吳量愷、崔曙庭、李國祥註解，《張居正集》四冊，湖北：荊楚書社，1987。
- 陳生璽、賈乃謙，《帝鑑圖說評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陳香吟，〈居上林，登十洲——〈上林圖〉考辨與成畫意涵探析〉，《史物論壇》，8 期，2009 年 6 月，頁 27-74。
- 陳香吟，〈明清〈若蘭璇璣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
- 傅希齡，〈桃源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2001。
- 楊鐸，《張江陵年譜》，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 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冊 14。
- 劉金庫，《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
- 劉美鴻，〈小皇帝的教科書《帝鑑圖說》及其版畫藝術〉，《國家圖書館館訊》，1998 年 2 期，頁 9-11、1998 年 3 期，頁 9-13。
- 樊樹志，《萬曆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 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 期，1990 年 2 月，頁 11-31。

- 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東京：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90。
- 河野元昭，〈探幽と名古屋城寛永度造營御殿〉，《美術史論叢》，1985年2期，頁91-116、1988年4期，頁131-153、1990年6期，頁99-124。
- 榊原悟，〈帝鑑圖小解〉，收入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2，頁124-137。
- Clunas, Craig.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rawford, Robert. "Chang Chü-cheng's Confucian Legalism." 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ed. William T.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Fong, Wen and Watt, James C. Y. ed.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Distributed by H.N. Abrams, 1996.
- Goodrich, L. Carrington and Chaoying Fang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明代名人傳.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aing, Ellen Johnston. "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 3/4 (2000): 265-295.
- Ledderose, Lothar.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oore, Oliver. "Violence Un-scrolled: Cultic and Ritual Emphases in Painting Guan Yu." *Arts Asiatiques* 57 (2002): 86-97.
- Mote, Frederick W. and 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urray, Julia K.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no.1 (Spring 2006): 20-67.
- Murray, Julia K.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David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40-2
- Murray, Julia K.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XXXI (2001): 65-101.
- Murray, Julia K. "Keynote Address: Narrative and Visual Narrativ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In Alexandra Green ed., *Rethinking Visual Narratives from Asia: Inter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26.
- Murray, Julia K. *Mirror of Morality—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Wu Ho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頁》<http://gallica.bnf.fr/services/engine/search/sru?operation=searchRetrieve&version=1.2&collapsing=disabled&query=dc.relation%20all%20%22cb403581367%22> · 檢索日期：2015年10月5日。

A Study on the Late Ming Woodblock Printing of Admonitions in *A Mirror for the Empero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Lin, Li-ch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 Mirror for the Empero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originally was an imperial story textbook handwritten and illustrated with paintings. Shortly after the Longqing emperor (r.1567-1572) passed away, Zhang Juzheng (1525-1582) led a group of officials in compiling it. In 1573, it was engraved in wood blocks and printed. The Pan Yunduan woodblock printed edition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in terms of the primary nature of its illustrations and the carving of the woodblocks, is of considerable quality. As a result,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is Pan Yunduan imprint, with various aspects pointing to it as the on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painted version. The Pan print edition is also used as the basis here for discussing the contents, editorial purpos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mage in *A Mirror for the Empero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With the help of other textual evidence, further analysis is provided on how this book influenced the Wanli emperor (r.1573-1620). Not only was text used for narration, Zhang Juzheng with the illustrations in this book also skillfully transmitted information difficult to convey with words, successfully leading the Wanli emperor to model himself on the exemplar cases of previous ruler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important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both text and imagery. In doing so,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rue motivation behind Zhang Juzheng's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while attempting to explore issues that have been difficult to address in art historical studies on didactic pictures; i.e., how didactic imagery affected intended audiences and their reaction to the teachings contained therein. Thu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is book played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Wanli emperor's rule.

Keywords: *A Mirror for the Empero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Ming dynasty woodblock printing, Zhang Juzheng, didactic painting, Wanli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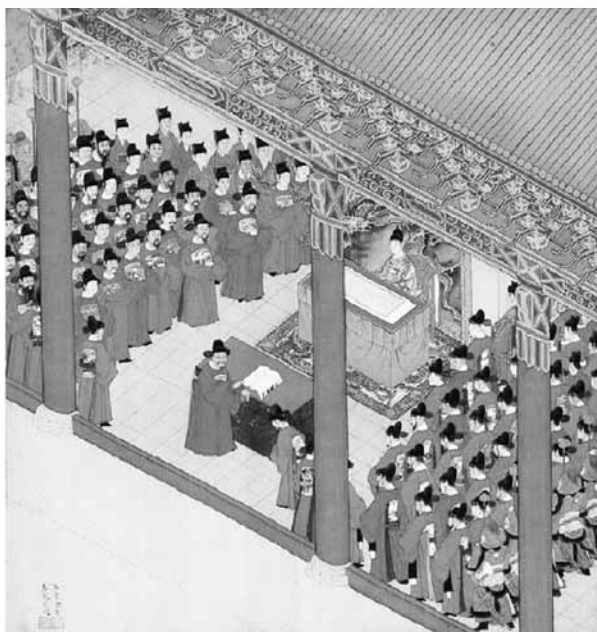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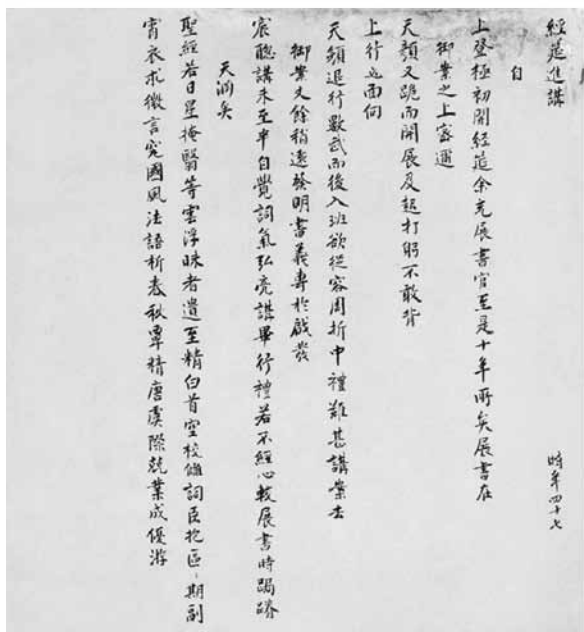


圖 1 明 余士、吳鉞 經筵進講 徐顯卿官蹟圖 158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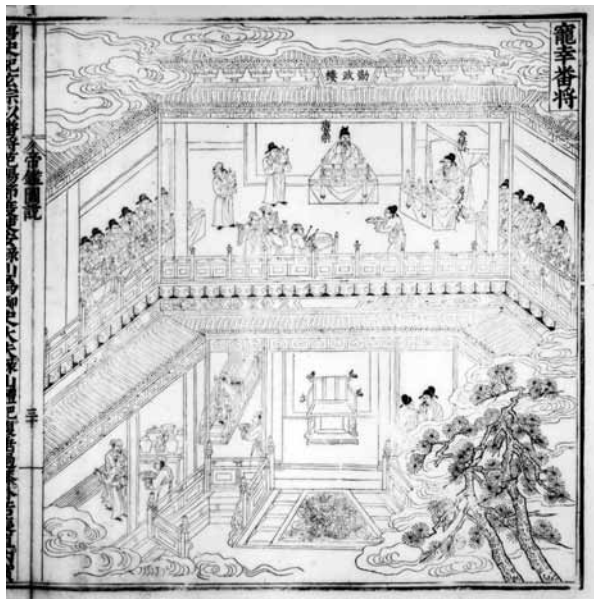


圖 2 明 張居正 寵幸番將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3 遊畋失位 *Recueil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s Empereurs Chinois* 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4 明 張居正 君臣魚水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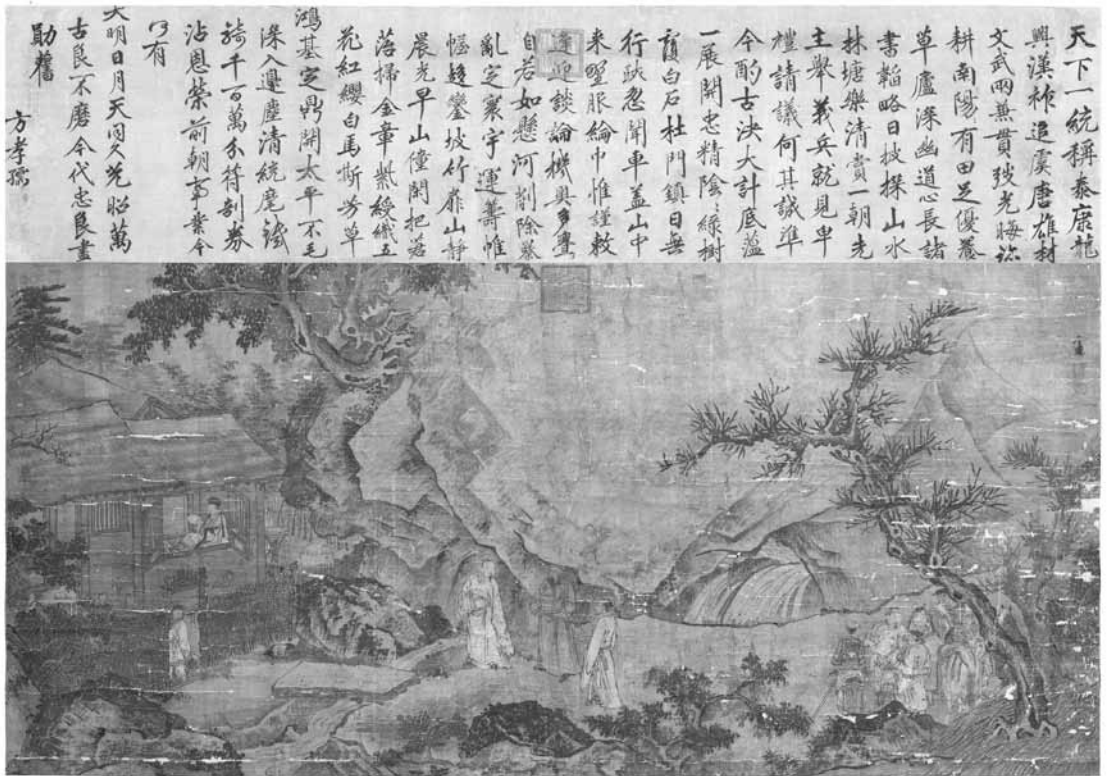


圖5 傳李迪 三顧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下一統稱秦原
 興漢祚追漢唐
 文武四無貫
 致光悔法
 耕南陽有田
 足優養
 車廬深幽道
 心長諸
 書韜略日披
 探山水
 林塘樂清賞
 一朝先
 主舉義兵就
 見半
 禮請議何其
 誠準
 今酌古決大
 計底蓋
 一展開忠精
 陰綠樹
 竇白石杜門
 鎮日無
 行跡忽開車
 蓋山中
 未望眼綸中
 惟謹救
 迎鑿論機與
 多疊
 自若如懸河
 割除莽
 亂定寰宇運
 籌帷
 幅趨鑿坡竹
 扉山靜
 晨光早山徑
 閑把茗
 落掃金章紫
 綵纒玉
 花紅纓白馬
 斯芳草
 鴻基定鼎開
 太平不毛
 深入連塵清
 繞虎踞
 跨千萬萬分
 符刻券
 沾恩榮前朝
 事業今
 日有
 大明日月天
 國光昭昭萬
 古良不磨今
 代志良畫
 勛舊
 方孝孺



圖6 明 張居正 君臣魚水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將潘允端本由冊頁式構圖，改成長卷構圖後的圖像



圖7 元 三顧孔明 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國志平話 取自《三國志平話》，收入於《古本小說集成》，頁66-67



圖 8 明 周文靖 歲朝圖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繪畫全集》
10, 頁 126, 圖版 117



圖9 明 張居正 德減祥桑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 取自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2，頁37



圖10 明 張居正 苜檻旌直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 取自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冊2，頁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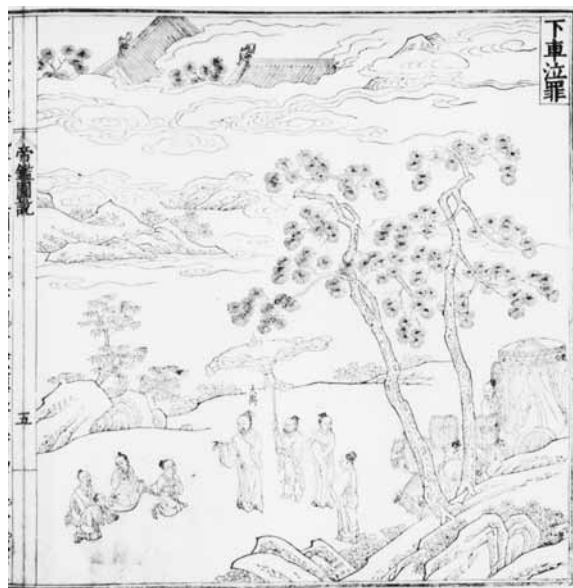


圖11 明 張居正 下車泣罪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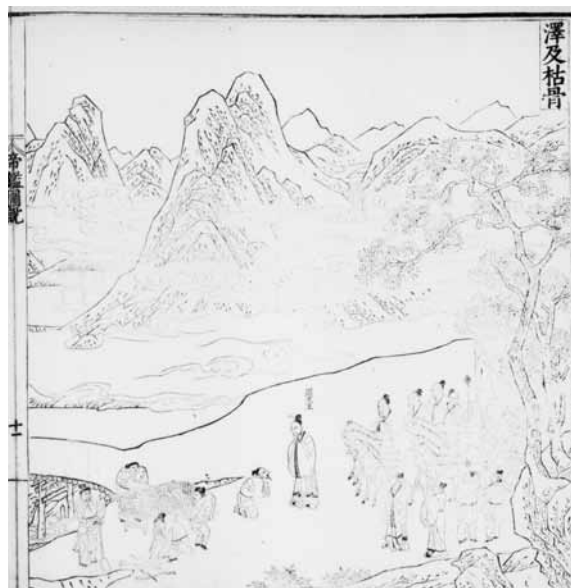


圖12 明 張居正 澤及枯骨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3 明 張居正 脯林酒池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4 明 張居正 大營宮室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5 明 張居正 遊幸江都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6 明 張居正 觀燈市里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7 明 張居正 斂財侈費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



圖 18 南宋 佚名 折檻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唐太宗的形象 願為良臣 日記故事 1542 年原刊 取自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冊 2，頁 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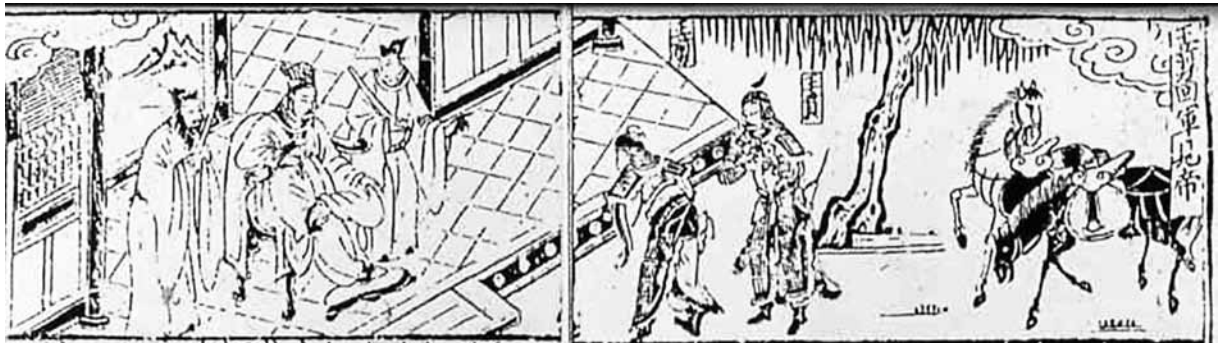


圖 20 秦始皇形象 秦併六國平話 取自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冊 33，頁 18-19



圖 21 燭送詞臣 *Recueil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s Empereurs Chinois*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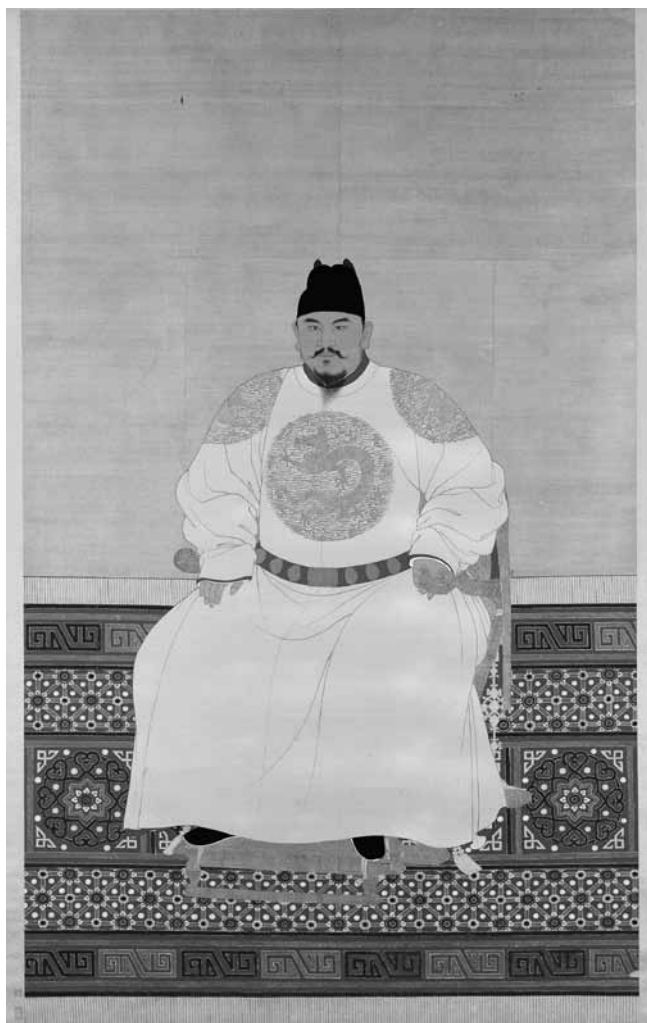


圖 22 明太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 明 張居正 褒獎守令 帝鑑圖說 潘允端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館藏